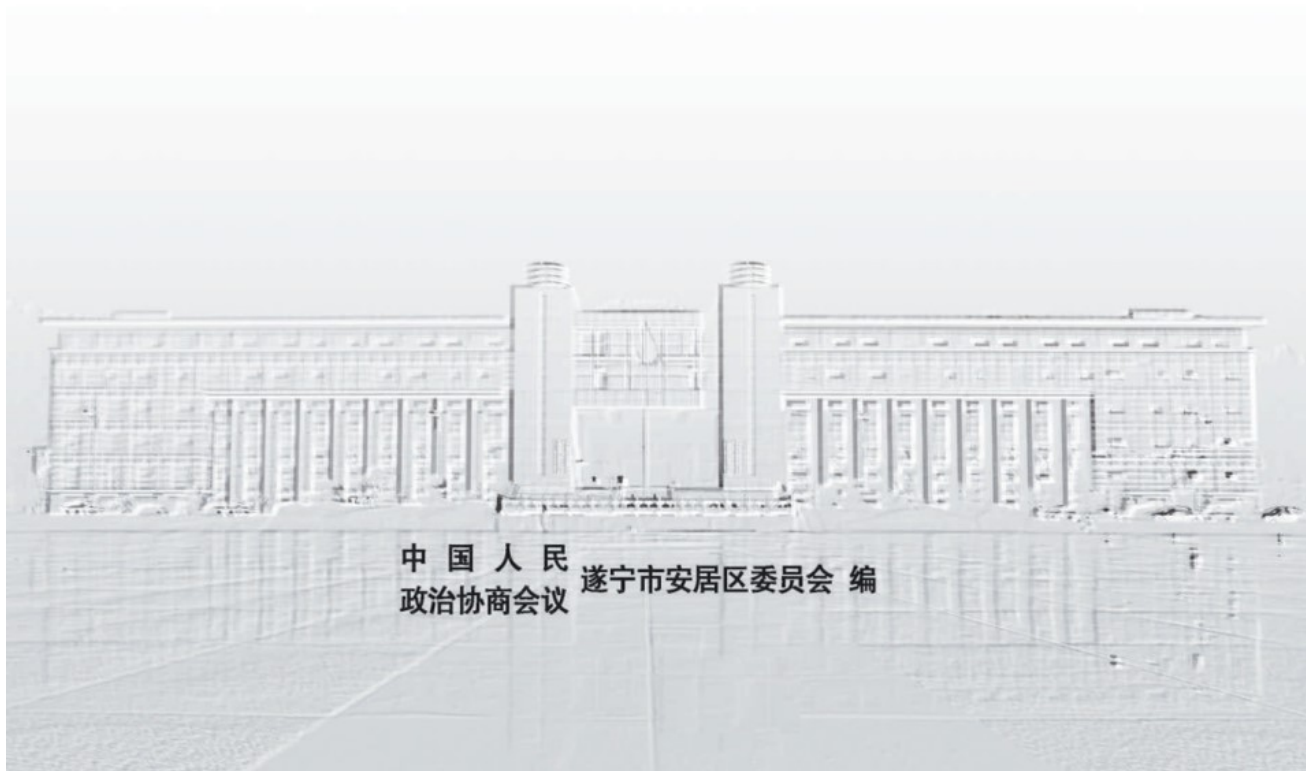


# 安居文史资料

AN JU WEN SHI ZI LIAO

<第八辑>



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

遂宁市安居区委员会 编

##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

### 关于“六、二五”王勇事件始末

1974年6月25号一早马家公社二大队党支部书记韩子良到公社报告：该大队九队下乡知青王勇死在二队郑家院子当门田里。公社立即报告到县、区政府和有关部门。引起了各级高度重视，县委立即指派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宋梅英和公安局副局长高德生带领公安局、知青办等组成工作组，到公社后伙同公社有关干部组成工作小组，有的勘察现场、验尸，有的深入群众调查，此事件一下传遍了四面八方。

### 当时的历史背景

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来，各学校就很少正常上课，长期停课闹革命。加之全国机关、企事业单位、工矿企业都一律停止招工。滞留在城市里的无业青年很多，无事可做，有的到处流荡，少数人沾上了不少流氓习气，到处打架斗殴，胡作非为。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号召城市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很快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我们公社从1969年到1974年先后接收下乡知青250余人。他们大多数表现很好，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艰苦奋斗，入了党、入了团，后来成了国家各方面有用人才。但也有较少数的人，带来了坏习气，感到农村劳动艰苦，生活清贫单调，加上又脱离了父母管教，一些人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纠集一些气味相同的人，到处惹事，你来我往，做一些违法违纪之事。加上当时农村社会治安比较混乱，打人、抢劫、强奸之事时有发生。该事件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据群丛反映，6月22日王勇因有十几天未回来了，一回来就说他的东西被人偷了，没有吃的，找到队长向质彬家去撮谷子，队长妻子跪倒他面前说好话，说不要撮谷子，我们一大家人要生活，反被挨了几下，还是估计撮去150多斤谷子。队长找到公社党委书记田海全，田书记到队上来给王勇做工作，退了100斤谷子回去。剩下50斤打了个借条才算了事。

### 事件发生的经过

根据调查，当天一大队三队知青李隆平一直同王勇在一起。

几个工作组下去分别调查，我同公安局副局长高德生一组，负责询问李隆平，高问，我负责记录（我当时是公社党委秘书）下面是李隆平讲事发经过的全过程。

6月25日上午王勇邀请了我（一大队三队知青李隆平）廖多富（二大队十队知青）三个人一起到二大队五队堰塘里去炸鱼，由于炸药太少，一个鱼都未炸到。一同回到王勇住的二大队九队，看到该社车河沟里的水，车干后捉到几条鱼，说是卖给社员，王勇去捉了一条大的约有一斤多重，也未称，就捉到王勇家里煮，我们三个人吃了。到天黑时廖多富被对门十二大队一队知青喊起走了，只剩我们二人，感到无聊，又想起来炸鱼。听说前几天大队上在修水渠在放炮，肯定有炸药，可能在支书韩子良那里管起。当时王勇找了根尺多长的小钢棒儿，我找了一把改刀，我们就往大队办公室走（办公室在八队地界），走去没有人，但引起了院子里狗叫。有个青年人打个电筒来看（社员叫何国喜）当时正好不得看见，王伸手把电筒抢过来说借用一下，何一看是我们未说啥子就回去了。我们得了电筒就说到五队去找好朋友刘洪恩一路。走刘洪恩家，看到刘洪恩被他父亲押起跪到堂屋里正受父亲教育（刘的父亲刘仪生当时是县农业局干部）不好去喊，就走到该队队长刘进锡家，叫他给带路到韩书记那里去，刘说大家都晓得我刘瞎子，晚上找不到路，你们到下面院子找人吧。二人走到下面院子找到一个人（地主郑催）估到带路去找韩子良。郑无法只好带过河沟后就指上面院子就是，郑就转去了。走到上面院子去打门叫快起来，结果起来的不是韩子良（而是韩的弟弟韩安云）又叫他去喊韩子良来一下，他去将韩子良和他妻子叫下来了，把他们叫坐到屋里，我们二人一边一个坐到门外面，给他说了我们要点炸药来炸鱼，韩说好话，说我们修渠都未够哪里还有炸药（实际还有根本不敢给他们）。说了半个多钟头，没法我们就走了，走过河沟后到三队晒坝提（也是队上保管室）有3个人守夜在床上睡觉。看到床枕头上放有只电筒，王伸手去拿起来，说我们这电筒不太亮了，借用一下，当时三个人说好话，说我们守夜责任大，出了问题要负责任。（三个守夜的是郑朝贵、郑朝立、何国立）我们走到外面田坎中间，因找不到路，王就叫他们守夜的来把电筒拿去，就来了一个人（郑朝贵）走拢时，我们把他夹在中间，叫他带我们到二队陈国芳那里去，他把我们带到陈国芳院子当门说就是这里到了，他就走了。看到陈国芳门是锁起的，王用钢棒敲烂，到屋里将灯照亮（陈国芳在大队学校教书，那晚到赤脚医生舒家淑（军官家属）那里去了，未回来，想找点吃的东西，但一样都未找到，在那坐了一阵，又在桌子上写了一会儿字，无聊又走出来。电筒一照看见当门有一树梨子树，去摘梨子来吃，梨子还未成熟，

边走边吃，怎么碰到这么多人就打起来了，我脚上挨了一下，打起电筒就往下面田坎上跑了，往后面坡上过去就回到我们队上去了，后面的就不知道了。

原来三队守夜的人电筒被拿去了，又把郑朝贵也带走了，剩下两个人吓到了去叫队长和社员，我们的电筒被知青拿去了，把郑朝贵也带走了，怎么办，知道这些人不好惹，又恨又怕，当时就来了十几个人，各人手上都拿了一个东西，走，去把郑朝贵找回来，一路走到陈国芳当门，大家就在当门田坎上，看到他们在屋里走来走去，就是未看到郑朝贵（郑也从另外的路走了来碰到）又不好回去，当看到他们二人出来摘了梨子，往外走到田坎时大家就打起来，一个往下面跑了，一个电筒打落了，天黑大家打了儿就各自走了。当时听到在闹，二队也起来了些人，共计可能有 30 多人（当事人说那时可能已深夜两点多钟了）。

第二天早上院子里的人起来见到王勇已死在当门田里，派人去报告了大队支书，后报到各有关部门，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开了。

### 事态的发展

当天中午就将王勇的妈、姐姐、姐夫接到了公社，专门派妇女主任范绍群负责接待工作。

当天进行尸检后，用白布 119 尺进行裹尸，安放到哪里，各级领导就同家属商讨尸体的处理。领导意愿是尸体就地安埋后再说其他事，对方要求尸体要运进城，并严惩凶手。根据验尸发现头上有一条寸多长的口子为致命伤，加之流血过多而死亡，经排查到场人各人所拿东西，只发现何念开拿的一根挑水用的扁担断成了两节，认定该社员为主凶手，当天予以逮捕。县上在开扩大干部会议，在会上将情况通报后，广大干部很不服气，认为只准他们乱来，不准农民自卫。在当时只有这样才能说得过去。但对方还要求枪毙凶手。分歧意见很大，一致达不成协议，而后事态越来越大，由于天气热，尸体已发臭，各地知青仍串职，来来去去的人不断，多数来的人，听讲了实际情况后就走了，但后面又不断再来。公社办公室由公安局的同志在守起，公社只好搬到粮站空仓库里去办公。从 27 号到 30 号，人越来越多，情况逐步严重了。到 7 月 1 号抢尸，当天上午一下来 80 多人，到生产队到处抓人抬尸体，有人在家的抓人，无人在家的打东西，弄得全队多数人都跑了，有的连猪都牵到亲戚家去了。抓到 10 几个人押到将尸体抬到公路上。拦到了公社架车队的郑明福（本队人）将车挡到，叫郑当班长将尸体放

到架车上，并留下 8 个人护送，其余跟了很多知青，拉倒西眉黄板石又拦到一辆拖拉机，将尸体放到拖拉机上，人也上到上面一起运到城里县委大院，当时将县委书记辛清碧拉去闻死人。后经多方做工作，同意坐下来谈判。下面被拉去的人由公安局的人安排到旅店去了，并保护了他们人生安全，第二天送回来了。县上将去的人包了一个餐馆就餐，又动员各街道干部动员各位家长将各自的知青劝回家去，这样人走了，才达成了尸体火化，和后续处理工作，才基本告一段落。

### 后续处理工作仍在进行

在这几天中，外面还有来人，均由公社伙食团负责生活安排，共吃大米 143 斤，副食费用 111.7 元，扯裹尸布 119 尺，在抬尸到二大队二队，见无人的户就乱打东西，杀死架子猪二只，扯烂蚊帐 4 龙被单 4 床，将粮食倒在厕所里 114 斤，打烂水车 2 架，打坏各种农具 31 件。尸体拉到西眉镇时到供销社拿走春城香烟 47 条，以上各种损失费 764 元（那时物价都很低，一斤米才 0.138 元，一斤肉 0.70 元）后由县民政部门拨款进行了赔偿，在县上各种费用由县上负责。

在此事件中四处谣言很多，弄得人心惶惶，很多人不敢在家里居住，在这混乱之时，又有少数坏人乘机破坏。在抬尸当天，由三家公社串来一流氓卓兴旺，碰到一成年妇女（儿子在当兵）在田坎上摘菜，几句大话一吓，在田坎上将妇女强奸了，被发现后，工作队的同志追了十几里路才在西眉广林寺将此人抓到，后判刑十年。

对原被抓去的社员何念开，未作任何处理。到 1976 年事件平息后释放了，生产队还给他记了工分。在那件事后，各地进行了一次打击那些胡作非为，破坏社会治安的事件进行了处理，我们公社先后逮捕四人，社会秩序得到了好转，由此事件产生的影响才基本消除。

文史专员：范志民

2017 年 6 月 20 日

关于大跃进时期农村公共食堂的回忆

邓正洪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四岁多，建国七十年了，我有幸和共和国一起成长。今天祖国的强大人民的富有令咱们中国人骄傲自豪，祖国经历的坎坷和辉煌都令我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近年来，据说北京和有的城市出现了餐厅饭馆打出“大食堂”“公社食堂”“人民公社食堂”等招牌的现象。我们遂宁城里就有餐馆名曰《人民食堂》。这在青年人看来是件新鲜事，可能引起他们的好奇，老板以此招揽生意，多赚银子。然而，老一点的人，特别是经历过公共食堂生活的人的记忆中，“公共食堂”留给他们回忆并不那么甜蜜。

那么，为什么大跃进时期农村普片建立公共食堂？为什么两三年后又纷纷解体？带着这个问题我查阅了一些资料，结合自己的回忆，写了此文望读者教正。

### 一、农村成立公共食堂的初衷

经查阅有关资料得知：1958年夏天，“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部分农村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自发地建立起了一些公共食堂。这一所谓“新生事物”刚一出现，就被上升到解放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最有效的措施被大力提倡。

这年8月，党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建立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作为建立农村人民公社不可或缺的内容，在全国农村迅速推开。

而我们遂宁农村普片成立公共食堂也就是在1958年下年。当年我刚考上初中，上学时都是在家里吃的饭。在学校生活一段时间后，一天学校放假，叫学生们回家拿钱交生活费。我回到家里才知农村已经成立了公共食堂——农民习惯称之为“伙食团”，我们全家一日三餐都集中到队里的伙食团吃饭，已经不允许在家里煮饭了。

通过在校的实事政治学习我们才知道：中国当时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为了尽快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必须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1956年党的八大也提出了正确的路线，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经济社会发展观的一次历史性飞跃。

为贯彻执行总路线，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各地还有很多大跃进的口号，

如要“一天等于二十年”地干社会主义，争取“二十年超英赶美”等等。

那时强调“集体化生产，军事化管理”，农民种地也搞“大兵团作战”——打钟吃饭，吹哨出工，一切行动听指挥。

当时的宣传说建公共食堂有很多好处：

一、可以解放妇女，让她们走出厨房，直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二、可以节约劳力：一个妇女在家做饭只供一家几口人吃，可公共食堂几个炊事员做饭够上百人吃。

三、可以节约粮食和燃料。民间早就有“一锅费柴二锅费米”的民谚。认为建公共食堂就可以节约人力物力。

四、农民干了活就去公共食堂吃饭，没有后顾之忧，就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

五、农民干活不要钱，去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因此中国几千年没能解决的农民吃饭问题现在一下子就解决了。

还有六啊七啊等等等等，当时又有口号鼓动农民“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

开始吃公共食堂的时候农民还是感到新鲜、好奇、满足，一日三餐既能吃饱，又不要钱，还可以“饭来张口”吃现成，何乐不为呢？大家高兴极了，以为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

就连当时的文艺工作者也紧跟形势写了很多作品，特别是一首我们遂宁的民歌《公社食堂凉粉香》曾唱遍了遂宁的大街小巷。遂宁的大，小会上要唱这首歌，有上级领导来遂宁视察，招待晚会上更要唱这首歌，这首歌在当时已成为遂宁县各个文艺团体的保留节目。

不仅如此，《公社食堂凉粉香》很快还唱到绵阳，唱到成都，再唱到了北京。还灌成唱片在国内发行。向国人扎扎实实介绍了一回遂宁凉粉，也足足地夸了一回“公社食堂”。

当然，此现象不仅我们四川遂宁农村有，全国农村几乎都一样。比如《京畿春秋》中北京市丰台区记载的《北京市农村公共食堂的兴起与解体》一文写道：“……公共食堂开伙那天，村村社社像办喜事一样，吃打卤面，大人有说有笑，

孩子欢蹦乱跳，十分红火……”

从理论分析，农村建公共食堂是美好的，是可行的，它是人民公社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当时能看到这样的标语、听到这样的口号：“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

但是，公共食堂的实际情况很快证明了理论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美好的理论不一定就能够指导实践。

## 二、农村成立公共食堂的具体作法

成立公共食堂具体做法也很简单，那时候农民除了衣物和简单家具小型农具（如锄头等）是自己的外，其他大型农具、牲畜、房屋等等一律收归集体。把房屋较好的一两家农户搬开，用他们的房屋建厨房和食堂，各家各户把自己家的粮食通通挑到公共食堂去交集体统一保管，再把各家各户的饭桌、凳子搬到食堂去就完了。

为了方便群众就餐，开始公共食堂规模还小，一般是以就近的两个三个院子建一个食堂，一个生产队就可能有三四个公共食堂。可是这样一来伙食标准就难做到绝对一致，同是一个队有的食堂生活好，有的食堂生活差，群众自然就有意见。于是很快就撤销小食堂，一个队只建一个或两个大食堂。

## 三、农村公共食堂的实际情况

1958年到1959年上半年人们是吃得饱饱的，原因有二：

其一、1958年农业大丰收，生产队粮食储量充足。

其二、进入公共食堂前，农民积蓄的粮食较多。因为中国农民辈辈代代都有节约粮食的习惯，每年所收获的粮食都有“细水长流”的安排计划，特别注重“长计划，短安排”，哪怕粮食歉收，要挨饿，也要匀着饿。

农民宁可每天饿一点，每顿省一点，绝对不会图一时饱口福“胀几顿”，然后无粮就“饿半月”——就如农村那句古老的谚语批评的：“有时一顿怂，无时吃谷种”。

所以成立公共食堂时家家户户积蓄的粮食一下子堆到公共食堂的保管室，犹如千流归海，粮食就显得特别多。

再加上当时人们盲目乐观，以为已经跑步进入了共产主义社会，于是生活安



排就大脚大手，加之公共食堂初建，缺乏管理经验，很多时候煮的饭吃不完就倒掉。我们队的很多老人见了这种现象很心疼，常常指责，说这样浪费粮食是要遭报应的！

1958年虽然是丰收年，可是队里抽调大批壮劳动力去炼钢铁，地里的庄稼缺乏劳动力收——例如当年的红苕很多没挖回家就烂在了土里。

据说1958年彭德怀在《故乡行》中就写道：

谷撒地，

薯叶枯，

青壮炼铁去，

收禾童与姑，

来年的日子怎么过？

我为人民鼓与呼！”

就由于这些原因，为“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创造”了条件，埋下了隐患。公共食堂的问题很快就暴露了出来。归纳起来就有：

1、没法照顾特殊人群。公共食堂不可能满足每一个人的口味，更不要说老年人和小孩子和病人产妇等等的特殊要求。曾经有人在家里煮给小孩、病人、产妇吃，但很快被禁止，理由是这样就可能出现偷盗粮食（包括山粮）的事件，公共食堂就会垮台。为了制止这种事有的地方还把每家的锅强行没收了。还把私自在家煮饮食定为非法行为，要受到处罚！

而有的农户离食堂远，分回的饭早就冷了，想热，可又不准私人烧火，并且也无锅。

2、没法接待自己的亲友。别的不说，就说父母儿女之间：父母想看望已嫁的女儿，或是女儿想回娘家看望年迈的、生病的父母就成了极尴尬的事，去了无处吃饭。

后来也曾有过人性化的措施：给予来客“客饭”的待遇。但客多客少，客人来往的时间长短等等，情况千差万别，又成了难以“一刀切”的难题。再后来，三年困难时期粮食越来越紧张，就连本食堂的人都难以吃饱，哪还顾得了你的亲戚！因此无论多么亲的人，哪怕是生身父母探望儿女，或儿女探望父母都只好空腹而来又饿着走，以至一般亲戚就断绝往来。

3、严重缺柴。家家户户各自开锅煮饭时，无论柴草粮食稿秆分给一家一户各自弄回家好好保管作柴烧，不够时山上的野草，竹木的落叶都会收集起来作柴烧。可公共食堂谁还那么尽心尽职的捡柴呢？后果是：枯枝败叶满山都有，可公共食堂却无柴煮饭。于是拆草房，砍树子作烧柴，就出现了毁农房，毁山林的现象。

我们队里有一片国林，原本古柏森森，隐天蔽日，几人合抱的大柏树满林都是。结果很快就被附近的食堂砍来做柴烧，连树兜都被挖光，三年困难时期之后，那里留下的只是一片百孔千疮的荒地，至今也只有有一些荒草杂树。

房拆了，林毁了，还不够怎么办？有的地方甚至就出现了掘坟毁墓掏棺材作燃料的事件。春木村深基湾里的一些坟墓就是那时被毁的。事后很久坟主才得知噩耗，后人哭哭啼啼来到现场，将先人的遗骨一一收集起来装进坛子，重新掩埋。

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食堂暴露出的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粮食也越来越少，有了上顿没下顿。只有水不缺，尽量多掺水，煮清汤。民间就流行有这样的民谣：

丝瓜也打汤，  
茄子也打汤，  
一天三顿清汤汤，  
老子肚皮成了溜水缸。

那时，只要能入口之物——无论野草野菜，螺蛳黄蟮，甚至老鼠等等都弄来吃，不准煮就烧起吃，不准烧就生吞活剥，真正成了“见啥吃啥”“有啥吃啥”。

面对饥荒人性暴露，有的干部凭权力多吃多占，有的干部心系民生，发动群众利用田边地角大种瓜豆小菜（瓜菜不属于国家统购物资），使群众少挨饿。干部多吃多占的问题在后来的“四清”运动中作为理麻干部的主要问题。

社员无权就小偷小摸，为防止社员偷粮食，有的地方还组织民兵夜巡。

当时我的老家——三家区大坡公社七大队九生产队——现在的安居区三家镇春木村九社就发生过一起典型事件：邓王氏去大安公社女儿家回来的路上，见刚收割庄稼的地里有散落的胡豆，就捡了一荷包回家，当晚就偷偷用香油罐煨给全家人吃。

可巡夜的生产队长带着民兵循着香味搜寻，锁定目标后便破门而入，邓王氏

被逮了个正着。队长一口咬定她是偷的粮食。她说是捡的。队长就吼她态度不端正正是狡辩，邓王氏哭天喊地的叫屈。结果煮熟的胡豆被端走了，队长还甩下了一句恶话：“明天早上我才给你说！”

生产队惩罚偷煮粮食的人的情景邓王氏是亲眼见过的，既要挨批斗，还要扣全家的饭。她害怕极了，既怕自己挨批斗更怕连累全家没饭吃，结果就乘着夜色投水自杀了。

临投水前她还给了睡梦中的小女儿一次最后的母爱——脱下自己身上的一件棉袄盖在小女儿身上。

悲剧的发生令人发指，但是群众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直到1967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批斗生产队长时才旧话重提，群众要求清算生产队长活活“逼死烈士母亲”的罪行——因邓王氏是烈属，她的三儿子邓孝华抗美援朝时牺牲在朝鲜战场上。这在《大坡乡志》（1985年版）上有所记载。

类似事件不仅我们遂宁才有，著名作家张一弓发表在1980年《收获》第一期上的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就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眼看公共食堂困难重重，实在难以为继，农民巴望着它马上就解散，可是那时有些基层干部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还在强调“伙食团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反对公共食堂就是反革命”等等，强行维持着公共食堂。

#### 四、农村公共食堂的解散

1960年3月8日，朱德故乡行。他见到了他的老乡亲们，问了大家的生活情况后点点头说：“看到你们黄皮寡瘦的样子，我已经明白了。”乡亲们七嘴八舌地将公社公共食堂吃不饱饭的情况向他作了详细汇报。朱德听了摇了摇头，把拐杖重重地在地上戳了一下，叹息道：“公社食堂再这样办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就全国宏观情况而言，长达三年的严重困难局面，主要表现为：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建规模过大，粮食缺乏，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困难。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60年8月周恩来、李富春主持研究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时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

1960年冬，毛泽东乘火车前往杭州途中，把六个大区的书记及有关的省委书记叫到专列上，和他们研究有关农村工作的问题，特别提到“公共食堂”问题。

有的人不敢说真话或许不愿说真话就说公共食堂好，敢说真话的人就说“公共食堂”不好。

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曾经到武进一个村子调查研究，他当时没好发言。后来他把那个村支部书记、大队长的意见概括汇报给毛泽东，他深感痛心地说：“主席，办公食堂的损失，是很难计算的。食堂里的碗天天打破，筷子天天丢，这还算小。你再到公路上看看，树都砍得差不多了，都用来烧饭。原来一家一户做饭，小孩去搂一搂，弄点树叶，烂柴草，就可以了，现在都烧木柴，毁了多少木材啊！”

毛主席说：“看来可以搞几个调查组，田家英一个，陈 XX 一个，胡乔木一个，到农村去搞调查，搞它一个月，看看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如果他（那个村支部书记）说得对，全国的食堂一风吹！”

这一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这个方针，经 1961 年 1 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这个方针。后来，中央又多次召开会议，进一步制定了一系列贯彻落实的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坚决的全面的调整。

而对农村工作的调整是对原来人民公社“六十条”草案进行了修改，形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这个文件改变了过去要求每个生产队都办公食堂、社员口粮分到食堂的硬性规定。

其中，第三十六条明确指出：“在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对于参加和不参加食堂的社员，生产队都应该同样看待，不能有任何的歧视。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口粮分配到户的具体办法是：可以在收获后一次发，也可以分期发。”

显然，这样的决定大得人心，社员们广泛拥护。随着文件的深入贯彻，在全国农村勉强维持三年之久的公共食堂，按照农民的意愿才相继解散，真正执行了毛主席说“全国的食堂一风吹”的指示指示。

往事越千年，纵观历史，伟大的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很强的生命力，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尽管建国七十年来，我们经历了那么多坎坷，那么多苦难。但是我们最终战胜了敌人，也纠正了自己的谬误，终于发展到国强民富的今天！真可谓“柳暗花明又一村”。

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可能有困难，很可能还有坎坷，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

前程无限光明!! 中华民族必圆自己的复兴梦，中华民族必将永远雄踞于世界。

(全文 5488 字)

作者 邓正洪

定稿 2019.4.8

### 家庭成分及其他

家庭成份问题曾经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问题，自它产生那天起就紧紧伴随着每一个中国人，历经三十来年。最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才淡出历史舞台，进入了历史博物馆。

遂宁地区是一九五〇年解放的，之后农村就轰轰烈烈地进行土地改革，无论城乡划分家庭成份也就随之而开始。

搞土改先得确定家庭成份，农村人的成份根据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占有量的多寡，和生活来源的方式（有无剥削）一般划分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中农、贫农。中农又细划为富裕中农、自耕中农、佃中农、下中农。下中农和贫农属于农村最底层最贫困的阶层，统称为“贫下中农”。

刚刚解放时，“家庭成分”是一个全新的名词，全新的概念，有的人还不了解它对自己今后生活的影响，因而曾闹出过“政治笑话”。原遂宁县三家区胜利乡二村——现在的安居区三家镇春木村六社，土改积极分子邓平安，在村农会讨论评定家庭成分时，土改工作队的同志说根据他们家的情况他家应该划为贫农。邓平安当即反对，他说：“不行，不评为地主至少也该评个富农……”最后议来

议去，给他定为中农。邓还耿耿于怀，他私下里说：“我婚都没结，评个贫农说起都不好听！”

后来，随着土改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才知道：按政策农村的地主和富农是属于阶级敌人，是专政的对象。贫下中农是属于人民，是革命依靠的对象。中农是争取的对象（小土地出租当中农看待）。

而地主家庭和富农家庭中的成年人，参加过剥削就称为“分子”，统称为“地富分子”，加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统统称之为“四类分子”，加上一九五七年之后产生的右派分子统统简称为“地富反坏右”即“五类分子”，文化大革命时期被统称为“黑五类”，按政策统统属于专政的对象。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人们的意识里在农村地主成份是最高的，之后依次是富农、小土地出租、中农、贫农。而中农里面最高的是富裕中农，它接近于小土地出租和富农。之后依次是自耕中农、佃中农、下中农。

那时中国学习苏联经验，记得前苏联电影《列宁在 1918》里面，列宁有句台词最经典，他对富农说：“你们存在一天就要向我们提供粮食，你们要反抗我们就要镇压！”

解放后进行土地改革，基本内容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有的地主就要反抗，反抗就要受到镇压。轻的镇压是批判斗争，罚跪，重的镇压通常是枪毙——用子弹击碎头颅，民间俗称“敲沙罐”。

当时人们对“敲沙罐”感到既新奇又刺激，无论大人小孩都想一睹为快。所以一旦获知哪天哪里要开斗争大会，要“敲沙罐”，十里八乡的人都要跑去看热闹，以至小孩斗嘴都以“老子要敲你沙罐”来恐吓对方。那时曾流行有童谣曰：“地主地主，日你屁股，你不干，敲你沙罐”。

地主富农都是敌人，对他们就要进行专政。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所以对他们就要进行坚决地斗争。因此那些年代无论交朋结友或是婚恋择偶都特别看重家庭成份。随着阶级斗争越来越深入此观念也越来越强，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极致，那时都兴“亲不亲，阶级分”不是人民就是敌人，没有中间路线。

虽然党的政策是反对“唯成份论”，主张“要看成份，不唯成份论，重在表现。”也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但具体贯彻执行的时候往往是“宁左勿右”“越左越好”。真正在选人用人时，在交朋结友选对象时，有谁会面对众多根

红苗正的“贫下中农”不选，而去选择“地主富农”“黑五类”呢。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一方面在批判“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洞洞”的反动的血统论，在喊：“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就跟着毛主席，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而实际对人对事中却又是“宁左勿右，越左越好”有意无意地信奉着“血统论”。

那年代无论升学、当兵、就业、招工、提干都要填履历表，表格的开头几栏一般都是：“姓名，性别、年龄、民族、家庭成份、政治面貌、主要社会关系”等项。有的表在“家庭成份”一栏之后紧接一栏是“个人出身”——可能就因考虑到有的革命干部他们家庭是地主成份，有的地富子女一直在学校读书，这类人填表时才好在这“个人出身”一栏填上“革命干部”或者“学生”，以此区别其家庭。

基于“家庭成份”这重大政治问题，在世间演绎出了很多趣事。

一、“红”“黑”两成份兼有。

1、同是一家兼有“红”“黑”两种成份。有的家庭全家都在辛辛苦苦务农，靠自己的诚实劳动获取生活资料，但他家有一个人却不从事农耕，靠另外的途径获取生活资料。这种情况就出现了一个家庭两个成份的现象。

比如解放时遂宁县大坡乡丁洪春家就属这么一个特殊的家庭。当时的大坡乡六村——就是现在的遂宁市安居区三家镇九岭村。该村的丁洪春，本人在解放前曾当过大坡乡乡长，他没务农，居住在乡政府。而他的妻儿子女都在老家务农。

所以解放时评定家庭成份就只有他一个人评为地主，而全家成份则为中农。因此他的家庭就是“红”“黑”兼有的家庭，人们戏称他们一个家“大半边红小半边黑”。

2、同是一人兼有“红”“黑”两种身份。这就是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或孙子女。有的是他们自己、有的是他们的父母解放前后投奔共产党，参加了革命。这种人回到老家他们是“黑五类”的子女，文化大革命中更贱称为“狗崽子”。但是他们一回到父母或自己工作的单位就被视为革命干部，或者革命干部的子女，是“红后代”。

3、地、富分子不能住机关。

有的地富分子的子女在解放前和解放后参加了革命工作，他们在单位生儿育



女无人照料，有的就把乡下的父母接来料理（实际是当家庭保姆），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单位领导发现后往往就要出面制止，说上级有规定“地富分子应该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不能躲在机关里享清福”，还担心他们对革命后代灌输剥削阶级思想，培养出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接班人。

## 二、人人怕沾“高成份”。

常言道“桂花香十里，狗粪臭三垅”，贫下中农很吃香受重用，地主富农臭不可闻。随着形势的发展，阶级斗争越来越升级，人们就越来越怕沾到“高成份”的边。然而人们步入社会难免不遇到上学、就业、入伍、提干、婚姻，甚至打官司等问题。不但自己家庭，甚至上至祖宗三代下及儿孙，旁及五亲六戚，外公外婆，姑表郎舅，他们中一旦有人“家庭成份高”那么一般就被认为这样的人“社会关系复杂”“有乌疤黑迹”，那么升学、就业、入伍、婚姻、提干都会受到影响。甚至判案和干部处理日常纠纷首先都要问清当事人的家庭成份，再往下说——以避“屁股没坐正，替阶级敌人说话”之嫌。

而自家及五亲六戚，外公外婆，姑表郎舅都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那么就会认定为“政治清白”“根红苗正”，是可堪培养重用提拔的对象。

六、七十年代在高中学生中“选飞”，有的同学就遭遇过这种坎坷。有的人无论祖宗三代、家庭成份或是自身条件什么都好，结果在“政审”一关被刷下了——原来他们中有人的外公的表亲是地主，有人的舅舅的舅舅在台湾，甚至在海外，就担心他们以后驾着飞机跑到台湾去，跑到外国去。

据说文化大革命时，遂宁的“造反派”翻操出历史档案，才发现遂宁中学对某一届高中毕业生，在“政审”后就分为“优先录取”“可以录取”和“不予录取”三等。这“不予录取”者除其他原因外，家庭成份必然是第一考量。这些学生的考卷上盖上“不予录取”的大黑印章，就被打入“另册”，任你平时表现多好，成绩多好，试卷答得多好都不屑一看。

## 三、婚恋观的改变。

按传统的风俗习惯找对象首先是考虑“门当户对”，农民的通俗说法是“篾门对篾门，板门对板门”。自划分家庭成份后，农村男女青年找对象首先就要看对方的家庭成份，这是首选项目，可以认为这是新的“门弟观”，革命的“政治观”。贫下中农有女都愿嫁贫下中农，就是地主富农的女儿也愿嫁贫下中农——

因子女的档案随父。甚至地主富农的儿子也愿倒插门“嫁”到贫下中农家当“上门女婿”，还让自己的子女也随女方姓，使后代彻底摆脱“地主”“富农”这一称谓的困扰，完全彻底融入“贫下中农”之中，成为革命依靠的对象。

因此也就演绎出很多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婚姻故事。有的年轻人自由恋上了家庭成份“高”的，被父母或者单位领导发现后，立即被“棒打鸳鸯”，被“强拆”。有的虽然家庭成份好，但因健康状况、个人品行、情趣爱好等诸多原因发生“婚姻困难”时又会上演“拉郎配”“强媒硬保”“苦打成招”等等闹剧。

也有的因家庭成份“高”，女儿虽然不愁嫁，但是儿子既娶不进又“嫁”不出，其父母为了家族的繁衍，香火的延续，就找媒人说合：“要娶我家（地主家）的女儿为媳，他家的女儿就得嫁入我家（地主家）为媳。”这就是农村曾经流行的“调换亲”，真可谓“互利互惠”“两利双赢”。

有的地主富农家的姑娘为了帮自己的哥哥、弟弟娶到老婆，只好忍辱负重，自我牺牲嫁到不愿嫁入的人家去，以换回自己的嫂嫂或者弟媳。当然这样的姑娘有的会感到值得——虽然牺牲了我的幸福，却赢得了兄、弟的幸福，又圆了父母传宗接代的美梦。有的当然也含恨终生甚至闹出离婚逃婚甚至轻生等等悲剧。

#### 四、家庭成份引出的纠结。

1、有的地主富农家庭的子女，解放前一直在读书，读书时就参加了革命，解放后自然被提拔为干部，有的还操练成了权倾一方的革命领导干部。可填表时在“家庭成份”一栏仍得填上“地主”或是“富农”。遂宁的邓领章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邓领章同志祖籍遂宁县三家区大坡乡十二村，即现在遂宁市安居区三家镇八角井村，其父邓百川在当时大坡一带是有名望的人。解放前邓百川的几个儿子都参加了地下党，邓领章就是其中之一。

当时地下党领导人蒋德刚到大坡乡开展地下活动就住在他家。就因邓家是地方上的名门旺族，所以国民党地方当局明知此事却不敢过问。蒋德刚就在邓百川家以收学生教书作掩护，在国民党地方当局的眼皮底下大肆开展“地上”活动（敢于从“地下”发展到“地上”就全仗邓百川的保护），使大坡乡一带党的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为迎接解放打下了很好的社会基础。（这些在《大坡乡志》和党史资料中都有记载）

解放后邓百川家被划为地主成份。他的几个子女都分别参加了工作。地下党员邓领章被调到安岳县从事征粮剿匪组织农会，开展土改等工作（当时安岳属于遂宁专区）。

邓领章对自己家庭成份的划定一直很纠结，各时期一直都在申述，请求更改家庭成份。后来邓领章调到安岳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任局长，有人劝他说：“你都是老党员，老领导干部了，不要去纠缠家庭成份问题了。”他回答说：“我不纠缠家庭成份，可家庭成份要纠缠我！”可直到他年老病逝他家的成份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

他们这一类老革命按规定无论填什么表，“家庭成份”一栏都只得填上“地主”“富农”这个耻辱的符号，背上这个这个耻辱的包袱。

邓领章的二哥邓学诗更坎坷。蒋德刚在他家搞地下活动时他就参加了地下党，掩护过地下党的活动，甚至解放前夕他也积极参与抗丁抗粮，组织地下武工队迎接解放。可土改时他家划为地主成份，他当时已是成人，所以也被定为地主成份。

因此在一些政治气候下他被拥为老地下党员，老革命，被捧为上宾。而气候一变，又被视为地主分子，党籍也不予承认，甚至被认为是“混入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还受到过残酷的批判斗争。

改革开放后彻底落实了党的有关政策，邓学诗才得以恢复了党籍，享受到了应有的待遇。每年七一节庆祝建党活动还被请到会场，坐在主席台前参加会议。

2、更为难的是他们这一类革命干部的子女。本来他们已经是老一辈地主的孙子辈了，可是他们升学、入伍、入团、入党、招工、提干……都得填表，“家庭成份”一栏都得填上“地主”“富农”这个臭不可闻，人见人畏，人见人厌的耻辱符号。所以家庭成份问题也使他们纠结。

邓领章却刚正不阿据理力争，他的子女长大后无论填写什么表册时，他都不准在“家庭成份”一栏填“地主”，而要填“革命干部”。他的理由是：实事求是党的一贯政策。我的子女不是出生在地主家庭，而是出生在工商行政管理局，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机关。如果要填成“地主”那嘛除非承认工商行政管理局这个机关是地主机关，这个单位是地主的单位，这个单位的领导是地主领导。

他还提出：共产党人是彻底的革命者，要查历史就不能只查祖宗三代，要上

查二十代、三十代，姓秦的就要查到秦始皇那一代，姓刘的就要查到刘帮那一代，姓蒋的就要查到蒋介石那一代，姓汪的就要查到汪精卫那一代……邓领章是有名的“老地铁”——老地下党中的铁嘴，没人说得过他，此事曾在安岳闹得沸沸扬扬冤冤不解，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 3、一般地主家庭的子女的成份问题。

按土地改革时的政策规定：凡过上三年地主富农生活的其成份应定为地主或富农，凡自食其力满三年的即不为地主富农。

那么解放后出生的地主子女，特别是他们的孙子女，根本就没过一天地主生活，可是在填家庭成分时也得填上“地主”“富农”。所幸还有“个人出身”一栏，这些人就可以填上“学生”以示区别。

家庭成份问题曾经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大问题，这一政治问题困扰了有关一些人的一生一世，一代两代甚至三代，也因此上演了很多悲剧、喜剧、闹剧、滑稽戏。

“家庭成份”这一政治色彩极浓的称谓一直延续了三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全国城乡，党大刀阔斧地开展拨乱反正，对过去若干历史问题作出了客观的定论，“地富分子”统统摘帽子，“家庭成份”这一称谓才淡出人们的政治生活。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些复复杂杂的家庭成份问题终于得以彻底解决。特别是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生活得更体面，更有尊严。大家都一视同仁，生活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灿烂的阳光下。

（邓正洪 全文 5378

字）

造价 800 万，投工 400 万，牺牲 10 余人，费时十八年

### 拦江人民勒紧裤腰带建水库

我家两代三人在水库工地上流血流汗，我爸爸是个“正能量”的老代表，我哥哥是个“正能量”的小代表，我是水库工地小小宣传员，我爸爸我哥哥每年挣回一张大“喜报”，我从“发蒙”就开始每年从学校挣回两张小“喜报”，三父子比赛挣“喜报”，到水库建设完工，到我高中毕业，我家墙上的奖状不论“张”论“层”，我的好几个春节和寒暑假都在水库工地过的。我们也是水库的受益人，遇天干地旱，几十里外的都能放水到我们家田里头，毛爷爷说的“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硬是有道理。

安居区拦江镇的“新生湖”的老名字叫“洛阳桥水库”，从 1958 年开始勘测设计到备料、开工清基筑坝，全面完成配套工程，费时十八年，直至 1976 年全面产生效益。“新生湖”以前叫“新生水库”，因为水库修在“新生公社”的山里头，“新生公社”以前叫“马河”，“大革文化命”那阵嫌没得“革命味道”，因为这里的人民“获得了新的生命”，改名““新生”，但我们还是习惯叫“洛阳桥水库”，因为，现在水库大坝的位置以前有坐小桥就叫“洛阳桥”，本来洛阳桥并不出名，拦江剿匪时在那里打了一个大胜仗，全歼近千各“九路军”，史叫“洛阳桥大捷”，从此洛阳桥名头一直很响亮。

## 好事多磨开头难

拦江地区是个农业区，拦江地区是个老旱区。1958年，遂宁县领导考虑到要解决拦江的根本问题，只有建一座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水利工程，农业才能上得去。县委副书记雷金声和拦江区区委书记张玺、区长陈国佑商量研究，报县委同意，组织部分水利技术人员，随白安河以上至乐至新建乡进行实地勘测，经多次论证、概算、地质勘探、集雨面积、净流、占地、库容灌面、坝基坝型，整个工程的投资概算确定，选址“棒棒碑”（新生乡8村），库容6000万方。由于工程量太大，又移到其上游洛阳桥。到1959年冬开工备料，清基截流。

遇到三年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1年），洛阳桥水库的修建停工，丢下一个烂摊子。1964年国民经济有所好转时，拦江区又上报县委地委（（当时遂宁属绵阳管辖，“地委”是“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后，又经相关专家和领导多次到现场勘查、测量、反复论证。县委书记辛清碧、县长高志远、水电局长宋国清、工程师罗均衡、技术员陈祥市、陈国佑、测量员游永昌、地区水电局付局长徐盛尧以及拦江区委书记施润生、区长郭绍云、区委副书记熊祚康等，均多次到实地考察。

经反复论证，认为坝址选洛阳桥不当，一是集雨面积小、蓄水少、灌面小、施场面窄等问题，因此决定就把库址移到下游“棒棒碑”。好处一是占地少（淹没面积530亩；二是库容量大（1500万方）；三是水位高（海拔是400米），下游拦江所在地为350米，相差高度为50米，全系自流灌溉，可供全区7个公社、70个村、530个生产队的田地；四是基础好，全系页岩；五是施工场地宽、取土石方便；六是集雨面积比原址宽，工程投资少，效益大，是一个宏伟的工程。后报经省水电所批准，列为全县中型水利三大工程（麻子滩、跑马滩、新生水库）之一。坝型为夹墙土石混合，坝高35米，长400米，确定于1966年冬备料，1967年冬正式开工。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各级领导班子受冲击，领导干部天天挨批斗，打的打倒，靠的靠边。1966年冬虽然打一些了石料，可迟迟开不了工。领导只有接受批斗份，“宏伟的工程”又泡汤，

## 乱世中水库工程硬上马

文化大革命中，拦江无政府主义严重，派性当道，有政府无权威。搭建水库

工程指挥部，组建施工队伍，遇到很大困难。无论是抽调干部、工作人员以及管理人员都有干扰和阻碍。后经遂宁县领导多方努力，终于组建起了新生水库工程指挥部：由县委书记辛清碧、副县长邹国光挂任指挥长；郭绍荣、唐治良（原县公安局局长）、古勤生（原县委副书记）担任副指挥长，做实际工作；以郑吉成（县民政科长）、蒋文清（县人事局长）、陈思章（水电局副局长）、技术员陈祥沛、陈国佑、游军昌等组成指挥部。

新生水库工程指挥部下设“政宣”、“施工”、“后勤”等部门。组成人员，由县上各单位抽而调来，工资、费用回原单位报销。拦江区还从区级单位、各公社、大队还抽调了一批人员建起了各级领导班子，如移民搬迁组、供应、施工、后勤、测量、医务、安全等等。

从1968年开始，就将库内淹没户155户逐户动员，由低到高分先后移迁到全区各公社，由各乡村社出钱、出力、出物，领导作出统一安排与协调，本着“自力更生”的原则，由接收单位和指挥部发动群众帮工帮料进行搬迁和修房造屋，使各户安居乐业，便做好每家每户的思想动员于安抚工作：新修水利造福人民、利在现在功在千秋……大家不但非常理解，还情绪相当高，国家当时给移民户的搬迁费是很少，每间房子只补几十元钱，单房更少。由于思想工作做到了家，他们都很自觉的搬迁了，有的户迁到较远的地方，他们自己也付出了不少代价，他们的大公无私、默默奉献为后人作出很好的表率，值得钦佩。

### **勒紧裤带修水库**

新生水库工程预算造价为800余万元，需要启动现金400万元，自己筹资80万元，国家只补助320万元。这些现金主要是用于购置建筑材料：钢材、木材、水泥、河沙、石子、炸药、雷管、煤炭、汽油、柴油、车辆运动费用，以及工程需要的设施等。其余80万靠全区人民来投工、投料、筹集资金。

根据当时情况，拦江区发动全区广大于部群众，贯彻“自力更生，坚持奋斗”精神，不等不靠，经过层层动员、各方努力，共筹集了现金141万余元、筹粮196000斤、木料数百根、竹子上万斤、稻草上万斤。共修民工住房100多间，建筑材料都是全区人民源源不断的自己送到工地上、那真是群情激昂、热火朝天，建的工棚纵横十余里。全区投工400万余个，许多工程人员因工很少报过出差补助和下乡津贴以及生活补助，特殊情况每天也只补2角钱（如高空、水下作业、

值夜班)。

当时施工机械化程度很低，全靠人力劳作。按照计划，该工程需要上民工 8000 人，其中石工 5000 人。大战第一期工程，必须在冬春要把大坝筑到 15 米高，才能溢洪，渡过洪期，一但溢不了洪，洪水将会冲毁大坝，造成下游两岸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为了如期完成任务，指挥部将石工民工数量下达分配到各公社、大队、生产队。每个生产队要上十多个劳动力，农业生产也严重缺人，形成搞生产和修水利互相争夺劳力。一些干部主张只抓当前生产，忽视水利工程；有的民工在水库做了工，生产队在给民工评工分时打折扣少评或不评工分（“工分” 是一个人一天付出劳动值的量化表现，一般情况下成年男壮劳力每天 10 分，成年女壮劳力每天 8 分，老人 5 分，我 1979 年每天挣 2.5 分，当年 10 个工分约值人民币 0.08 元）。这样一来，严重的影响了工程的进度。一旦到了汛期，洪水到来，后果就不堪设想。当时担任现场指挥长郭绍荣三头受气：上面领导批评、下面群众抵触，中间造反派批斗。

拦江区召开区乡村干部会议，通过大动员、大讨论、各抒己见，会上展开激烈斗争：有的主张少上劳力，就是上也上副劳，主要应该保当年生产，工程可以缓建。在资金物资筹集上依赖国家。后通过党的政策学习，认真分析了形势和利害关系，提高全体同志思想觉悟，再次激励了大家修水利的热情，鼓足干劲，基层干部和广大群众使愉快接受了任务。当时决定由各公社党委书记或乡长、大队书记或大队长亲自带队上工地指挥，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自筹资金和物资更加源源不断送到工地。

当时物资，材料和设备极其稀少，压土机、发电机、钢材、木料、抽水机、民工用的钢钎、大锤、十字铁锹、竹蔑，开山的炸药、引线、雷管、河沙、石子、煤、汽、油、煤炭、锅碗、医药等都是工地必须品，这些物资需要购买和运输就牵动到许多部门和单位。拦江在各部门单位抽调了一些人员组成采购组，派往成都、绵阳、遂宁，找领导、找单位、找部门，多渠道活动，争得各种物资指标（当时是计划供应），才将各种物资购齐，并源源不断得从四面八方送到工地。

#### **“四化”管理八千民工令行禁止**

来新生水水库工地人员是来至遂宁县上各科局人员和上级派来的技术人员，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头头和群众；保守派的头头和群众；还有逍遥派；另有还有从



外地请来的工程技术人员，负责勘测施工和近万名民工。这样组成复杂的人员，就带来了各种思想和情绪。加上人员又住得相当分散，上至千佛岩，下至新生乡政府，长达十余里，要把他们组织好、住好、生活搞好、工作好、安全好，确实要花很大力气，遇到无数困难。后经指挥部全体充分讨论，研究决定，实行四化：

“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管理民主化”，“生活集体化”。

各级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劳动纪律、施工操作规程、安全管理、工方定额、物资管理、财物审批制度、质量检查验收、奖惩考勤等制度。

政治宣传工作有板有眼：有针对性的做好各种人员的思想工作，通过大小会议学习、宣传、讨论，如：召开现场会、广播、黑板报、文字通报、个别交流、典型发言、回忆对此的现身说法，表彰先进，惩罚落后。在全工地开展比学赶帮夺红旗活动，内容：比工作质量、比安全、比进度、比出勤（出工早出勤人多人在后勤上，比卫生、比节约、比吃熟吃热。工程指挥还专门办了刊物《展宏图》，一天一刊，把广播和十张黑板报作为指挥喉舌，向上反映汇报情况、向下指导工作，把工作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做到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天天能看到工程进度质量、出勤与安全，整个工地红旗招展、气壮山河，歌声、口号声、放炮声整动云霄。

工地上 8000 多名民工，在工程指挥部管理下，统一领导、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团结作战、以工地为家，决心为建设好新生水库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 **拦江“铁人”创造人间奇迹**

修建新生水库的工地，地处遂宁边缘地带，右靠乐至县的新建乡，左靠蓬溪县的新花乡，离遂宁县城 160 多里，山高路窄、人烟稀少，乱石林立，解放前是土匪、九路军营集的地方。

工人来到工地，无住处、无办公室。各乡农民无偿送来树子、竹子、稻草、夯墙用的墙板。工人挥起锄头，挖地基、筑土墙、捆木架、搭草棚，日夜奋战，短短半个月，就在这一乱石山下建起了上 100 间稻草房，用作民工食宿、和办工房。利用石板石条，来做许多石床、石板凳子、石箱子、石桌子、石水缸。睡的石床铺、坐的石凳子、办公是石桌子，晚间十多人睡一个石床铺，数十人住一间屋。冬天透心凉，夏天脚气飘逸、汗气薰人，跳蚤随处见，蚊虫周身叮。我就在这工

棚里“欢度”过三个“革命春节”

国家工作人员，每人每月供应粮 27 斤（包括粗粮），供肉 1 斤，清油一两（包括棉子油）；民工自带口粮，各连组成伙食团，吃蒸蒸饭，每人只有一碗。一个个都整天干重活，胃子咕咕叫、心慌流口水、走路摇晃晃，但指挥部的干部和共产党员也同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起先锋模范作用，以工地为家。工地上到处是“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安全生产，杜绝事故”；“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标语口号。干部和共产党员象敢死队一祥，哪里有危险就冲向哪里。

新生水库及配套工程，拦江区干部群众经十多年的英勇奋战，流血牺牲，终于建成。原拦江医院院长王国局，新生八村会计肖志一，新民公社王祥州共十几位拦江人为兴修水利而壮烈牺牲。

## 磨难成为我的宝贵财富

刘耀空

### 引 言

我的脑海中贮存着往苦的记忆，那不是金色的年华，也不是美好的岁月，而是沉甸甸的人生。为了一个心愿，我打开记忆的闸门，从奔流的潮水中捧起那些涌动的浪花。

时间要回溯到五十四年前，我永生难忘的 1957 年。

那一年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渡口，我从那里登上了时代的航船，告别了幼稚和幻想，去接受严酷的考验。

那是一个风云突变的年份，现在想起来我的心还突突地跳……

我还清楚地记得，中考那天骄阳似火，考场却显得相当平静。我从遂宁中学卓娅大楼考试出来，自我感觉相当不错。

然而，万万没想到，我竟名落孙山！

我乡有好些原本成绩平平的同学都跨入了高中的校门，我这个被乡民称为“小精灵”的优材生却被淘汰出局！

我感到面前的路陷裂了，脚下就是万丈深渊……

正当我痛苦万分不能自拔的时候，伤害我的言论不绝于耳：有嘲讽中伤的言辞，也有幸灾乐祸的话语：有人对我的未来妄下结论，也有人散布轰动性的丑闻，猜测我在学校“犯了错误”……

有个老农对我说：“你娃这辈子完蛋了！”

我不知道他是指责我，还是同情我，不过他的话道出了人们对我的前途的基本看法。

我独自一人呆在屋子里“闭门思过”。回顾以往，我责怪自己少不更事，现在竟落到这个地步：面对现实，我茫然无措，一种失落感令我肝肠寸断：想到有人散布的“犯了错误”，则感到无比委屈，不仅前程断绝，而且落下个臭名声！

我痛苦、屈辱、焦急、烦乱，百感交集。许多天来，我坐卧不宁，情绪糟糕到了极点。一天夜里，我打开窗户，让习习凉风轻轻地吹拂发烫的面颊。我凝望窗外的夜空，浅蓝浅蓝的天庭缀着稀疏的星星，显得深邃而辽远。那是一个多么空阔的天体呀！我积郁的胸怀豁然开朗，精神为之一振。

我鼓励自己：不能悲观失望，而应该奋勇向前！

我有自己独立的人生价值观，并不在乎别人怎样看待我。

跌倒了爬起来再干——这就是我的誓言！为了践行誓言，我头扎进了红土地。

## 磨 练

记得初次干活那天，一位胡子大爷对我说：“当农民就要背太阳过山，你吃得下这个苦吗？”

我鼓起勇气说：“我不怕！”

话虽这么说，干起来却不是那么轻松。孟子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意思是说，艰苦的磨练要达到使人心意苦恼，筋骨劳累，肠胃饥饿，使之贫困的程度。开初我想，现在当农民了，必须尽快适应农村的环

境，先干些“手面活”，继后才干粗重活。我丢掉书生气，逐步进入了角色。挑重担的时候，尽管感到吃力，还是咬紧牙关硬撑着。一天下来，肩头又红又肿，皮肤发烫，肌肉如被马咬烂了一样难受。好在年纪轻，倒在床上睡一夜，第二天肩头就不那么痛了。第二天、第三天连续干，时间久了，肩头长了茧巴，就不怕扁担压了。挑担子是农村的常规活，农民的“家常便饭气人人习以为常。还有更艰苦的事，比如打稻谷、挖冬水田等。初秋，烈日炎炎，晒在人身上像火在烤，农民抓紧收割成熟的稻子，是“力尽不知热，但惜烈日强”的季节。打谷的人卡着比自己的两手不知要大多少倍的谷把子，先向上高高举起，快速地在空中绕一道弧线，然后使出猛力向拌桶里打去，这样反复若干次，才捆成谷草：再到田里去搂谷把子，重新卡、举、绕、打打完一季稻谷，农民手臂上、腿杆上被谷桩、谷叶割开许多伤口，手板、手指的老皮被磨出嫩肉，尤其是指尖还会渗出血迹来。收获稻谷要在水田里浸泡十多天，要经受天热、人累、肚饿、口渴的折磨。有一年，打完稻谷后我生了一场重病。数九寒天，生产队安排青壮年汉子下水田挖杂草。有种杂草名叫案板草，叶子像檀术叶，生命力特别强，是水稻的头号敌人，只有数九天才能锄掉它。那个时节，人们穿着厚棉袄还觉得冷，可见下水回去干活是个啥滋味。午饭后，参加挖田的人齐刷刷地跳进水田忙着干起来。现在我还回忆得起那个感觉：刚下水时，就像刀子在刺自己的腿，身子筛橡似的哆嗦起来，牙巴不停地打颤发出“咯咯”的响声，脸上、身上冒出许多鸡皮疙瘩。为了摆脱寒冷的痛苦，你什么都别想，只能使劲地挥动锄头，把怨气往杂草身上发泄。说来也怪，时间久了，腿冻僵了，感觉就麻木了，反倒不觉得怎么难受了。上岸以后，大家铁青着脸嘴，围在一起嚼煎胡豆，喝烧酒，然后跑回家去便一头钻进被窝里，睡到第二天早晨，起床后还感觉到腿里的骨头是冷冰冰的。

在农村的日子里，我干过多种农活：挑担、栽秧、打谷、挖冬田、犁春田、车水、打穷等。现在，犁春田、栽秧和打穷的情景仍记忆犹新。那时候，生产队底子薄，耕牛少，为了保护老牛，春天组织男子汉轮流去“抬田”，一个人掌犁把，两个人拉犁头，不管怎么注意，却免不了从头到腿都要沾上泥水，裤子在腰以下的地方全是湿的。我拉犁的时候兴致特别高，觉得自己是一头牛，便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鲁迅先生的名言：“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感到自己的劳动具有诗情画意。在栽秧的季节，老农看见绿色的秧子插进田里，心中涌现出无限的

欢悦，便情不自禁地唱起秧歌来，那歌声雄浑、悠扬，充满了对土地的感情和生活的希望，给人以美感和力量。老农唱山歌的时候，我也跟着唱，不多时，我也成了一名新歌手。在修堪筑坝的劳动中，由一名有资历的歌手领唱号子，打穷的人同声应和，号子越高亢，石穷就举得越高，堤坝就穷得越牢实。通过打穷，使我认识到人类与音乐的关系，音乐对劳动产生的巨大作用。

人们都说一个人到农村去，“要滚一身泥，要脱一层皮”。可不，乡间有“长年（长工）不顾衣”的说法。你想，农民成天跟泥巴打交道，怎么能穿得上一件干净的衣服呢？农民在运送人畜粪便的过程中，脏东西难免会弄到衣裤上，臭烘烘的气味也乘虚而入钻进入的鼻腔里。这时候，你只能“泰然处之，行若无事”。如果你不懂得这个“潜规则”，嘀咕“脏呀”、“臭呀”什么的，那么绝没有好果子给你吃，谁都会板起脸教训你：“假啥子（故意装什么高雅）？你口里吃的都是屎，哪样东西（指粮食、蔬菜、水果等食物）不是粪便种出来的？”想想这话有道理。怕脏怕臭就别当农民，变了泥锹还怕稀泥糊眼睛吗？至于“要脱一层皮”，读了我对挑重担、打稻谷、挖冬田的叙述，就理解其中的含义了。

农民又苦又累的劳动是无休止的。一年四季，暑去寒来，烈日似火，风霜如刀，雨里来，雪中去，登陡坡，下水田，从没闲过。农村的人说，要想痛痛快快地玩一玩，除非手脚长伸（指死亡）。正如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忙不完的红土地（按：原歌词是“黄土地”），喝不干的苦井水，男人为你累弯了腰，女人也为你锁愁眉。”我到农村以后，与锄头、扁担为伴，在泥巴里摸爬打滚，从肉体到思想，从行为到感情，渐渐与农民融为一体。人们已经看不出我是一个知识分子，我简直跟在学校时判若两人：略微弓背的身躯，黑不溜秋的肤色，手掌里像钢镚一般的厚茧，身上散发出一股因太阳曝晒而产生的特殊气味。这些特征足以说明我领到了当农民的合格证。我与农民同甘苦，共命运，语言相通，感情相融，实现了“脱胎换骨”的变革。

## 熏 陶

1958年是共和国建立后农村变革最多的一年。刚开年不久，农村便掀起了宣传贯彻“总路线”的热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学习愚公精神，改变山河面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标语随处可见。遂宁专区提出了“千百万”的奋斗目标，即水稻亩产 1000 斤，棉花亩产 100 斤，红苕亩产 10000 斤。为了实现“大跃进”气村子里不断出现超常规的“新鲜事”，春天全民吆麻雀，夏天夜晚挑塘堰（白天进行正常生产），秋天一哄而起成立了“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紧接着抽调大批青壮年到江油大办钢铁，稍后第二批男劳动力到桂花（南埋）、新桥（新太）修建川豫铁路（四川成都至河南信阳），最后挤出第三批劳力（包括老头和妇女）去挑大水库。这样下来，村子里只剩下妇女、儿童和老年人，即称为“386199 部队”看守家园了。我是第二批出征的人，为自己成为一名铁路工人而感到自豪。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那个时期最吃香，最受人尊重。我的任务是把工地上挖出的泥巴用车子拉出去倒在低洼的地方填路基。我特别卖劲，每天拉车的次数是全连（一个乡的建制）的最高纪录，多次受到上级的表扬。正当大家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听到铁路停工的消息，人们的心一下子凉了，只得回家种地。接着，水库也下了马。1959 年春天，去江泊的人被下放了一批回乡加强农业生产。1958 年农业没有实现“千百万”，1959 年和 1960 年庄稼连连歉收，群众生活非常困难，身体普遍出现营养严重缺乏的反应，水肿病威胁着许多人的生命，甚至一些未婚青年女子患上子宫突出病。在这个关键时刻，国家调整了农村政策，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形式和分配制度，解散了公共食堂，给社员划分了少量的自留地，允许社员在短期内开荒种菜，等等。政策对了路，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曾几何时，农业生产便基本得到了恢复，农民的吃饭问题也逐步得到解决。

面对农村发生的事情，我的心中曾产生过疑虑。后来读了一些政治书籍，才知道建设社会主义不是一帆风顺的，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达到目的，而是在曲折中前进，在探索中发展，要进行艰苦的奋斗，要走漫长的道路，正如后来党的文件上所写的“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我原来看待问题往往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而就简单片面地作出判断：处理问题只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忽略了客观实际，结果总是把事情弄糟。我经历了这个阶段的社会生活，我的认知能力在社会变革中得到了提升，由“幼稚型”向“成长型”迈出了一大步。

在回乡的岁月里，有几件事使我永世难忘。公共食堂解散后，农民的生活仍

然相当紧张，家家户户熬汤煮稀，吞糠咽菜过日子，却始终坚持着生产自救。有个单身老贫农，饭量特别大，而1961年秋收后只分到47斤稻谷，这是一年的细粮啊！他精打细算，琢磨着对口粮的安排。他把稻谷壳用石磨磨细，掺进一些麦粉，煎成粗粗，吃下充饥，导致大便拉不出来，难受得在屋子里爬来爬去，院里有个好心人用篇笠从他的缸门中一点一点地把糠末刨出来，才解除了痛苦。老贫农解放前一直给有钱人当长工，解放后分了土地，成天乐滋滋的，建合作社后他以社为家，对土地有深深的眷恋之情。他只歇息了两天便坐不住了，硬撑着身子到地里干活去了：1962年夏天，一个雨后初晴的下午，队里一头筋壮力强的大牯牛在山上啃草时溜到一个险崖上，牵动了全队100多人的心。牛是庄稼人的宝贝，被誉为“土拖拉机”，耕地犁田全靠它呀！几个壮汉不顾自己的安危，去到险崖上，用两条结实的大绳套在大牯牛的身上，山上几十个汉子齐心协力，终于把大牯牛拉了上去，人们提到，嗓子眼的心才落了下去。

在受灾的几年里，农民们勒紧裤腰带，自己吞糠咽菜，却始终想到国家，小春和大春收完粮食后，生产队便安排社员送爱国粮。为了尽快交粮，有的生产队按口粮或劳力把任务分到农户中去。于是各家各户闻风而动，男女老少齐上阵，挑的挑，背的背，那个场面极为感人。送粮是重体力劳动，从生产队到粮站足有20里，道路凹凸不平，且多属山间小道，负重行走极为艰难，那些老头、妇女、儿童及体弱、残疾的人所承受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尽管如此，却没有人发出一声怨言。农民的脑子里有个亘古不变观念：皇粮国税在历朝历代都是要交的。

著名作家张贤亮深情地写道：“我对我的祖国，我们伟大的民族都抱着磐石般的信念。这种信念不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更多的是通过艰难贫困的生活体会到的。”他的这段感言说在了我的心坎上。在三年自然灾害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跟广大农民群众一道日夜苦战，风餐露宿，忍饥挨饿，共度难关。尤其是农民对土地那份热得发烫的真挚感情，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在共同的劳动中，在共同的命运里，我走进了他们的内心世界，看到了他们高尚的品格：坚韧顽强的生存意志，团结起来的巨大力量，克己奉公的爱国精神。我由衷地热爱生我养我的家乡，热爱淳朴而高尚的父老乡亲。

这里要提到一件往事。1958年秋天，一位未升上高中的同学忽然来到我家，邀我一同到外地找工作。说句真心话，谁不想自己有个好工作，轻轻松松过日子？

但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对我影响极深，认为做人要堂堂正正，不能当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外跑人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明人不做暗事”。再有，我经过一年的劳动锻炼，觉得自己的认知能力有了不小的提高，但是还需要继续加强磨练，这对自己日后的人生道路将受益匪浅。于是我谢绝了他。不久，他来信告诉我，说他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并希望我也去。可是我没有动心。

## 进 取

我虽然失去了在校就读的机会，可是渴求知识的欲望丝毫未减。白天，我在土地上辛苦地劳作，晚上便独守寒窗，与书籍结为长相厮守的伴侣。

我的家庭十分贫寒，书籍多数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以励志方面的内容居多。我跟爷爷同室而居。晚上，爷爷睡不了多久就会醒来，老是念叨灯油贵，催促我吹灯上床。为了瞒住他，我便做了一个遮挡灯光的罩子，不让他看到灯光。夜深了，人们都进入了梦乡，我正凝神苦读，在字里行间驰骋，追寻着古今中外英才的足迹，向他们发出无声的呼喊。为了掌握书中的要点和牢记箴言警句，我一边阅读一边记录，笔记写了一本又一本。热天蚊虫无情地叮咬我，冬天两腿冻得僵硬麻木，但我顾不上那些，贪婪地吸收知识的营养。很多夜晚，直到眼皮沉重得无法张开，才昏然倒床而眠。晨鸟欢噪时，我又得起身，饭后便昏头昏脑地走向田间地头，强打起精神干活。回乡当年的初冬，我被派到外队去当分配红窑的监收。一天下午突然下起雨来，社员都回家去了，只有我留在地里。我见地边有一个石孔，就钻进石孔里避雨，竟呼呼入睡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被回到地里的社员叫醒。虽然在野外打盹，却睡得十分香甜——很长时间以来，我没有舒舒服服地睡过觉。

农村是我的人生课堂，也是我的“自修大学”。我长期坚持读书，即使后来娶妻生子，成了一个五口之家的顶梁柱，家庭的重担压得我直不起腰来，也总是见缝插针，如饥似渴地钻进书里。对于我的这股痴迷劲，绝大多数人都难于理解。有个亲戚问我：“假如在你的面前放着两样东西：一盘炒肉，一本书，你会选择哪一样？”当时能用红者填饱肚子就不错了，炒肉是令人垂涎三尺的好饮食，谁



都想把它送进嘴里、吞进肚里享受一番。可是我对知识的渴求胜过了对美食的需要，宁可放弃美味佳肴，去追求自己的至爱——书籍。

我只上过初中，很多知识都是靠自修获得的，历史、地理、生物等学科的知识得到了广阔的延伸，文学素养在广度和深度上更在不断地拓展。自学是艰苦的，没有人指点迷津，也没有资料和工具书破解疑难，全靠自己冥思苦索，难免会作出不少无谓的努力，产生困惑和烦恼。我如茫茫沧海中的一只孤舟，焦急地寻找着前进的方向。功夫不负有心人，许多看似极难的问题，最终却被我理解了。攻破了一道难题，就像士兵摧毁了一座敌人的堡垒，那种胜利的喜悦是无法形容的。文化水平的提高，为我以后从事教学和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8年，我在总路线、大跃进浩大声势的激励下，提笔写了一首反映农村“春潮涌动”的民歌《犀牛山》，没想到很快在一家省级报刊上发表了，后来被选进郭沫若主编的《红旗歌谣》。我欣喜地领到了第一笔稿费，用稿费买了一把大挖锄，表示自己扎根农村的决心。从此，我不断向报刊、杂志发去诗歌、唱词、新闻报道、生活故事等稿件，被《前锋报》（中共遂宁地委的机关报）和《四川农民报》聘为通讯员。但稿件的发表率并不高。正当我满腔热情地搞创作的时候，却听到一些泼冷水的议论，群众中有人说我写稿是为了挣钱，“搞资本主义”；乡党委一位领导干部则批评我“不安心劳动，图名图利”。我不得不考虑社会影响，只好搁笔不写了。

20世纪50年代，农村的文娱活动开展得非常活跃，逢年过节，村上都要表演节目。此前，团支部要组织青年中“有文娱细胞”的人排练节目。大家说我是“秀才”，要我编写演唱词或小剧本。因为是团支书给我安排的任务，所以便打消了顾虑，欣然伏案“夜战”（白天必须参加劳动，创作和排练只能在夜间进行）。在文娱活动中，我往往身兼编剧、导演和演员几职。1960年春节，我村在公社的汇演中得到了最好的评价，团支书高兴得手舞足蹈，奖给我们每个人一张大毛巾——那时候，得到奖励的大毛巾是很荣耀的事情。因为这次演出，我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影响很好。这年上期，乡党委安排我担任民办教师。

1962年9月，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1963年春上，我们公社便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于是，农村的阶级关系开始紧张起来。我出身于地主家庭，政治压力开始向我袭来。后来，中央针对出身

剥削家庭的青年，作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和“重在政治表现”的指示，希望他们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提高思想政治觉悟，走革命化道路。由于几年来我有良好的表现，公社团委决定把我作为地富子女的先进典型，安排我搞棉花高产试验田，参加“农业学大寨”的宣传活动，培养我加入共青团。我不负组织的殷切希望，忘我地工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1965年9月，我光荣地出席了遂宁县第一届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会上，我听到了平武知青的发言，发言者中也有出身于剥削家庭的人。我认为党给我们敞开了一片蓝天，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 创 伤

从县上开会回来以后，我的精神状态特别高昂，觉得8年来自己在农村的锻炼没有白费，对“党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深信不疑。

老子告诉我们：“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意思是说祸伴随着福，福隐藏着祸，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老子这句至理名言在我的生活历程中得到了证实。

1966年风云突变，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发出后，“文化大革命”运动如狂风暴雨，席卷全国，深入城乡。

1966年初冬，“文革”的烈火蔓延到我的家乡，一个偏僻的山村。村里的造反派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地富反坏分子。我家成为他们的重点打击对象，其原因不仅仅来自我的父亲，问题还出在我自己身上。

建国以后，农村中有些先进青年被选拔进入机关单位，广大农村群众说他们从糠箩里跳进了米箩里，眼红得不得了。一些农村青年则认为，如果自己被党团组织看重，就有可能摆脱泥土走进城镇，脱掉草鞋穿上皮鞋。于是他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在青海省交通厅工作的大哥回到遂宁休假（他的妻子在安居教书），中途回了一趟老家。有个造反派头头喜不自胜，说大哥自己跳出来往枪口上撞，帮了他们的大忙。

于是造反派接连几天召开会议，密谋策划，四处搜集我家的破坏事实，无限上纲地织罗罪名。造反派头头开宗明义地说，他们这个“革命行动”不只是要把

老地主彻底斗垮，还要横扫小地主的威风，把他（指大哥）拉下马，直到弄回家种田为止，“不达目的，决不收兵！”他嫌把大哥“拉下马”的“罪证”分量不够大，便炮制出一个爆炸性的新闻：无中生有地造谣说，我的大哥“带了一部发报机回来进行反革命活动”。

一天上午，100多个造反派扛着红旗，喊着口号闯进我们的生产队，几个骨干分子气势汹汹地跑进地里，把正在干活的父亲扭住拖进大院子，随即母亲也被抓过来。造反派命令父母跪在院坝里接受批斗。生产队的人涌进院子看热闹，外队、外乡的群众闻讯也陆续赶来，把院子挤得水泄不通。造反派头头向大家宣布了父亲的“滔天罪行”，然后带头高呼革命口号，那声音震天动地，直冲云霄。与此同时，几十个造反派闯进我家翻箱倒柜地搜查，凡是他们认为可以作“反革命证据”的东西统统拿走，我的书籍和笔记本被一掳而空，连《毛泽东选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鲁迅、茅盾的著作也不放过。为了寻找发报机，他们不惜钻床下、上墙顶甚至掘地三尺，结果一无所获，只得悻悻离去。

第二天晚上，全村召开批斗大会。造反派经过精心策划，先把父亲抓到主席台前，草草地斗争一番走个过场，然后叫我走到前面去。我明白了他们今夜的真正意图是斗争我。一个造反派头目首先向我提出一个看似“文不对题”的问题：“你为啥把你的大妹崽（大女儿）起名叫做‘6燕丹’？”我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我很喜欢燕子。”我的话刚落音，利箭便接二连三地向我射来：“你喜欢燕子，邓拓喜欢蝉，你和他是一丘之貉！”“你抛出的文章全是毒草，恶毒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你假装积极，企图钻进革命（团）组织！”“打倒现行反革命！”一句句尖刻而愤怒的语言如炸雷一般灌进我的耳朵，使我惊惧不已，茫然不知所措，脑子里轰轰地响……此后我不知道他们还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怎样结束了对我的批斗。

造反派对我的批判还在继续。他们挖空心思研究逼供方式，千方百计变换攻心策略，俨然成了专职的办案人员。如果说那天夜里对我施行的是无情打击，那么以后使用的便是“软刀子”了，晚间隔三岔五地对我进行政治攻势。一天夜里，一个造反派骨干分子别出心裁地朗诵起诗来：“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朝红日起，依旧与天齐。”那人念完后，以两道锋利的目光对视着我，问道：“你知道这首诗写在哪里？”我估计那人检查了我的笔记本，发现了这首诗，今夜来找

我的麻烦了。我承认自己抄了这首诗。那人便穷追猛打 z “这是一首阶级敌人反对社会主义，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诗！”我解释说 z “不是这样的。去年我读了剧本《方志敏》。方志敏在斗争最紧要的关头，为了鼓励警卫员增强斗志，坚持斗争，向警卫员读了这首诗。我认为这首诗很好，就抄下来勉励自己。”听了我的解说，造反派的其他成员报嘴一笑。那人知道自己抓错了“点子”，没趣地低下了头。不过他并不退步，却斥责我说：“不管怎么说，我认为你的思想就是有问题，回去要好好反省。”此后，造反派多次把我叫去检查思想，用“最高指示”作为理论依据，对我的“问题”纠缠不放。他们无中生有，无话找话，或一人出马，伶牙俐齿，高谈阔论：或轮番上阵，左右开弓，前后夹击。他们不怕浪费时间，喋喋不休地说到半夜，因为他们白天可以睡大觉，照拿生产队的工分不误。他们哪管我冷得发抖，膝盖以下已经僵硬。他们要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不仅要用政治攻势触及我的灵魂，还要让我受点皮肉之苦。

再说造反派在“革命行动”开始前曾把“发报机”问题上报了公安机关，后来公安人员下来调查，造反派却拿不出一丁点儿证据来，处境非常尴尬。开初他们野心勃勃，想轰轰烈烈大干一番，结果却扮演了一出自欺欺人的闹剧，弄得收不了场，造成了一种黑色幽默。不过他们仍不放过我，在“收尾战”中，一个头目猫哭老鼠似的说：“其实我们还是为你好，以免你犯政治上的错误，才来帮助你。你想出头吧，这种想法人人都有，不算错。不过，你也错了，不看看现在是谁的天下，别说是你，我们都难。你读书读多了，反而读迂了。告诉你，别再表现’了，否则还要碰钉子。”这场“革命行动”终于告一段落，但他们并没有鸣金收兵，时不时找我的茬子，跟我过不去。

尽管事实大白于天下，家庭和我的“丑闻”却传遍了十里八乡。亲戚不与我往来，生产队的贫下中农不跟我多说话，以避“敌我不分”之嫌，有事到外面去，认识我的人对我视若无睹，甚至投来鄙薄的目光。我似乎成了一个传染病患者，遭到人们的歧视、冷落并避而远之。

大约在我挨斗一个月后，我与生产队几十个人到公社修水渠，指挥部安排我们到岳父家里吃午饭。岳父家里的人害怕我这个“反革命”牵连他们而不愿与我见面，我去他们家时只见“空城一座”，吃了闭门羹。这让我意想不到，心中无比感慨，真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呀！后来冷静地想，岳父一家与我的关系被扭

曲成这个样子，完全是阶级斗争的残酷性造成的。岂止岳父不愿与我相见，还有更多让我心寒的事。我教民办的時候，有个教师推荐我作代课教师，区文教干事给我填表，询问我是什么成分，当听到我回答是“地主”时，他的脸上顿时露出恒色，握笔的手猛地向桌子上一击，然后愤然而去。他的表情和举动犹如一把钢刀刺向我的胸膛，使我的心在淌血：有一年，我在院子里买了一间瓦房，到区上去交房产税，民政干事因我出身不好，处罚我多交了 80 元钱（房产税应交 21 元），这笔钱相当于一头大肥猪的价值，我的妻子哭了几天几夜，眼皮肿得发亮：在学校里，我的儿女常常被同学打骂，有的老师也歧视他们。下课的时候，他们不能快乐地游戏、玩耍，而是被老师安排去干苦差事。办公室前栽了几棵小槐树，老师指定我的儿子站在树旁执行保护的任务，并且警告他说，如果小槐树遭到损坏，就要拿他是问。我的儿子在树旁守护了两个学期……

在“文革”十年浩劫里，我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心灵被刺出道道伤痕。但是我不流泪，不忧伤，不消沉，不颓丧。繁重劳动的磨练和艰苦生活的考验，培养了我的刚强意志和坚韧毅力，使我勇敢地挺直脊梁去面对人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 结 语

乌云遮不住太阳，正气必然要战胜邪恶。1976 年 10 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世纪伟人邓小平的复出，让伟大的祖国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昂首阔步，走向辉煌。

我于 1978 年 10 月经学友余恒之的帮助重返教育战线。我为自己的人生转折感到欣慰，深知这个机会来之不易，以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忘我地工作，博得了学校领导、教师和学生、家长的认可和尊重。

然而，我面前的道路并非从此畅通无阻，而是凹凸不平、曲折陡峭。在学校，有位领导出于私念，认为我是他的亲信（一个民师）“民考公”的最强竞争对手，便利用压缩民师编制的时机试图将我挤出学校。幸好那时学校调换领导，新来的熊校长坚持用人原则，才保住了我的民师资格：在农村，我的一个邻居纠集一些群众对我家寻衅滋事，曾几次到学校闹事，以达到把我弄回家当农民的目的。学

校领导明察秋毫，未让他的企图得逞：在家庭，我的结发妻子为了支持我的教学工作，独力支撑一个五口之家，克勤克俭，费心尽力，以至积劳成疾，后因一次脑伤而神经失常，成为不治之症，病魔缠身二十年死去。我那两个奋发向上、成绩优异的女儿因母亲的不幸而辍学务农，丧失了远大前程。为了支持我坚守教育阵地，亲人为我付出得太多太多。我无比感激他们，决心用突出的工作业绩去抵消心中的悲痛和遗憾。纵观几十年的人生历程，我几乎都在坑坑洼洼中迈步，在颠颠簸簸中行走，沾不上“一帆风顺”的边儿。

列宁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牢记列宁的教导，永远不忘过去。几十年的逆境促使我产生了强大的精神动力，鼓励我全身心地扑在教育事业上。

我得到党和人民的厚待，1995年被推选为市中区政协委员，1997年转为公办教师，2001年退休。我不甘清闲，又一头扎进书堆里，还为刊物撰稿，给一些部门编资料，乐此不疲。不少人关心我，劝我抛开一切，静心休养，何必自找苦吃。我回答说，书是我的挚友，怎能与它绝交？再说我大好的青春年华似水东流，很是惋惜，现在要抓紧有限的时间去弥补一部分过去的损失，心里才踏实，才不枉自在人间走了一趟。

2008年冬天，一位白发苍苍的辈辈老人冒着寒风两次来到我的住所，因我不在家未能相见。几天后，我们通过电话联系终于幸福地见面了。这位老人是我初中的莫佩铭恩师。我们师生在52年后重逢，那种激动和喜悦的心情可想而知。我回到农村后，莫老师心中始终牵挂着我，他不知我身在何方，情况怎么样，甚至担忧我现在是否还活在世上。他四处打听，终于知道了我的下落，便兴冲冲地赶来找我。我们见面后，莫老师心情沉重地向我讲述了当年那黑色的一幕：我初中毕业正是反右斗争的风口浪尖，教师中的个别极左分子，把矛头对准出身不好的学生，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牺牲品。莫老师说，他对当时的情况了如指掌，但爱莫能助。这成了他心中永远的痛。我向莫老师汇报了几十年来的情况。莫老师感慨地说：“你受的磨难太多了！”我兴致勃勃地说：“磨难是我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对我而言，在人生的过程中它是残酷的，结果却给了我许多美好的东西。”

## 那两年遂宁来了要饭的人

“要饭”即讨口叫化，此现象在中国可能延续了几千年，而新中国建立之后，广大农村进行了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人民安居乐业，此现象就彻底绝迹了。

可是1975年到1976年间突然又出现了讨口的人，有时逃荒讨口的人突然还多起来，有时成群结队地路过遂宁县境。

逃荒队伍多为老人小孩组成，老的六、七十岁，小的小十一、二岁。问他们从哪里来，大概他们也还有一种“集体荣誉”感，谁不说俺家乡好啊，所以他们都不说具体县区公社的名称，统而言之曰：“从岳武广来”。问他们为啥都是老人小孩，他们说村里不准青壮年出门，要坚持在家“抓革命，促生产”。有的人为了证明自己不是阶级敌人，不是反革命，是讨口的，还拿出了随身所带的证明——这是他们出发前去找村长开的。

据说村长又怕出证明，落下“支持外逃，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丑化社会主义”的罪名，但又不忍乡亲们困饿家中，所以有的村长只好冒着风险给逃荒的人开证明，放社员一条生路。

我就“查看”过两人的证明，一般都只写“因遇自然灾害，生活困难，外出投亲靠友”等语。玉皇老爷是不会申辩的，小小村官也懂得这个道理，因此就让天灾承担饥荒的责任。

当年笔者在本村教民办小学，一天正在上课，发现窗外挂有两个小脑袋，讲完课程安排学生做作业后，我就去问窗外的小朋友，这才知道讨口的是姐弟俩，他们也说是从“岳武广”来的。我问他们学过某课语文了吗，二人都点头。我就让他们背，他们就背起来：“爷爷七岁去讨饭，爸爸七岁去逃荒，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上学堂……”太滑稽太幽默了，但当时在场人心里都酸酸的，谁还笑得出来。

中午放学回家，刚要吃饭又见有小乞丐上门乞讨。我不但给了他饭还给了他米，见他小脚伢受伤流血，我又用白酒给他擦洗伤口，然后敷上药粉（我家常备有外伤药粉），包好后才送他上路。

事后很久很久都惦念着那小朋友。常常又后悔：咋不把那孩子留下来——虽然当时我们全家也在饥饿中挣扎，但总不至于留下他就会饿死我的孩子吧。

下课的时候，我们村小的老师们都站在操场上休息，看着成群的逃荒者从操场边路过，不免触景生情担忧起自己来。大家约定：要是饥荒继续加剧，轮到们出门乞讨时，我们一定跑远些，免得被熟人看见丢人，。或者干脆就呆在家中，饿死也要保持臭老九的名节，别辱没了孔夫子的脸面。

那时春有春荒，夏有夏荒，只无冬荒秋荒之说。每到春荒时节，等不到地里的豌豆完全成熟社员们都纷纷要求扯一些豌豆回来，摘豆角剥嫩豌豆米分给社员充饥——那叫“吃青”。

1975年4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在公房开社员大会，会后分嫩豌豆米。正在开会时又来了些逃荒的，其中一对老夫妇最令人同情。

大家围着问长问短，得知他们又是“岳武广”的人，老太婆已60多岁，老头子70岁，还说今天正是老头子七十岁生日。我们队的社员们感动极了，大家搬出土地改革时的老观念——“天下农民是一家”，纷纷提议就把他们当作我们队的人，也把嫩豌豆分给他们两份，就让他们留宿在我们公房里，让老爷爷也过个快乐的七十大寿。

结果我们真的把他们当着我们队的人，分给了他们两份豌豆米。最后还剩下了两三斤豌豆米没分完，要是往天大家都争着要“借”，各自会编出很多困难来“借”那点豌豆米，但是今天大家都没争没抢，全都送给了那两位老人。

老人感恩不尽，激动地说自己命好，说：“现在社会好，到处都能遇到好人。昨天在西眉区我们也遇到好干部。”原来恰好昨天西眉区上开干部会，有个女干部碰到他俩，不但送钱，还叮嘱他们：年龄大了，早晨上路不要太早，露水打湿了路，谨防溜倒就恼火了。

还有一段乞讨佳话。有个逢场天，一对老夫妇带着孙儿出门行乞，因当时人们都严重缺粮，所以他们讨到的往往仅是一碗红苕渣。于是他们就到食店里去要面开水泡，泡软后当稀饭喝下肚去——据说他们经常都这样。



看着那瘦骨嶙峋的老少三人，很多人都流泪了。一个食客于心不忍，就买了一碗面送给他们，两位老人当然首先是喂孙儿，可小小的孙儿也懂得孝顺，再三要爷爷奶奶也吃些。祖孙三人就这样推辞着，看得很多人泪流满面。这一段乞讨佳话感人至深，流传了好久好久。

所幸多灾多难的中国人命不该绝，1976年10月，四人帮跨台了，文化大革命也彻底结束了，讨口叫化的现象也从此绝迹了。

八十年代逐渐落实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大提高，生产力得到极大的发展，生活才迅速有所改善，人们也敢吃饱饭了。

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3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举行。十三大的主要精神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行改革、开放、民主，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国人从此才真正结束了饥饿的历史，过上了好日子。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史为镜可以资政。中国人经历了这么多折腾，这么多不幸，现在终于过上了好日子。

我们相信我们国家从此不再重复那样的苦难，小康之路越走越宽广，人民越来越富有，国家越来越富强。

（全文 1938 字 邓正洪）

## 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历程

“农业学大寨”在六、七十年代，我曾经工作过的马家乡（现属安居区）也和全国农村一样，那时的农业缺乏工业的支撑，缺乏科学知识的指导的情况下，只能用人的力量去改造旧山河。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穷棒子”精神去向地里要粮食，以求得生存。确实做了很多看得见、摸得着的大事，在当时起了很大作用，收到了较好的放果，影响了那一代人。但也做了一些蠢事和傻事，也出了不少问题。现在想起来，那确是一段值得总结的历史。现将所经历的、收集的情况综合整理如下：

### 学习大寨 家喻户晓

在 1964 年我国国民经从三年困难时期好转后持续发展的第一年。中央发出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决定。在二月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大寨之路的报道，并发了社论《用革命精神延续山区的榜样》介绍了当时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艰苦创业的事迹。此后全国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同年九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三届一次会议上，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人民解放军”的号召。指山大寨的根本经验是“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随后文化大革命中“农业学大寨”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高潮。先是各级组织广大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各省县社都派人去，我们乡先后派 12 大队党支部书记朱定远，八大队大队长唐明建，乡妇联主任蔡乐风，10 大队支部书记孔辉甫等 10 多人去参观学习，这样全国到处都川流不息的去，影响了那里的正常工作，中央才发出了不准再去参观学习的通知，在全国到处都发了宣传大寨的小册子。1973 年 3 月四川省请了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到四川来传经送车。各级组织干部群众听了 3 个小时的经验介绍，并组织了广泛深入讨论，大寨人为什么能在海拔千多米高的山区将七沟八渠一面坡的 4700 多块的 800 亩坡地改造成平、厚的 800 亩海绵梯田，粮食产量山亩产 140 多斤上升到 774 斤，这是自力更生艰苦的结果。层层组织学习、动员、作出规划，订山如何学习的实

际计划，组织人到处写标语，在一些石岩上现在还看得到这样的标语，深入了人心，做到了家喻户晓。

### 改田改土 做出样板

通过学习后，首先在 12 大队开始，从兴修水利，改田改土上着手，确实做出了很好的样板。后来被省上评为了改田改土的先进大队，1981 年地名普查时，大队取为治田村，为纪念改田改土作出榜样的象征。

那是 1973 年，在该大队 480 户，2410 人人平土地 1.25 亩，自然条件比较好。但在十年九旱情况下，粮食产量仍不高，收入更少。当年 7 月支书朱定远，大队长孙文德，驻队干部刘邦兴被县上通知到江油参观学习冬水田的改造。回来后立即组织干部群众以大寨人为榜样，改造山河，学大寨要大干，改造山河做贡献。

在党员、干部、社员代表统一了对改造冬水田的决心，变一季为两季才能真正解决粮食增产问题（在当时无化肥无良种的情况下）认识统一后，首先妥解决水利设施才能改田。说干就干。立即行动规划在花碑修一座 45 亩大的水库，马上调整土地，分任务、备石料、筹资金，分工负责，各施其责。很快组织起 950 个劳动的主力军。开工当天到处红旗招展各路施工队伍齐开往工地，一时指挥人员鼓动地声、音乐声从高音 1 喇叭中不断传遍一多长的整个工地，到处是学大寨要大干、苦战一月建成水库的大幅标语和挑泥、打夯和拉大石滚子的号子芦，挖土的和谈笑声形成的热闹景象真是壮观。经过一个月的苦战，如期完成了这个占地 45 亩，坝长 89 米高 6 米顶宽 2 米。能蓄水 10 万方的小二型水库。第二年就关满了水，为后来改用、自流灌溉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国家未出一分钱、这对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的一次检验，为后来的改造冬水田工作打下了基础。

对冬水田的改造在当时是个解决水稻生产长期上不去的关键，因为我们无自流水源，只能靠冬水田自蓄水，多年关冬水而行成的水田“冷、烂、串、毒”四大弊端，是严重影响了水稻产量的根源。在第二年水库以下七个生产队 400 余亩田秋收前全部放干，到了秋收后从 9 月 1 日起先组织 50 人的队伍，由团支书向安全为队长，作前期工作，理沟排水、划线打庄，划分各队任务，培训了骨干。

到开工大改冬水田时全村十二个生产队 1150 人的改田队伍，分部在三华里长的 400 亩改田工地上，展开了有史以来向大自然开战的战斗就这样开始了。

在这到处红旗招展，高音喇叭里鼓动声、歌声响成一片，好不热闹，让从这里经过的人都感受到感动，对周围影响很大。这里单是挖泥巴的锄头，是找西眉农具社专门打制的，长 1.2 尺，重 4—5 斤，锄把仅 3 尺长，带钩形整了生铁水的（在锄头口上用熔化了生铁水点成一坨一坨的，以不爬泥巴）以专挖稀泥巴。后来凡是这里来参观的都买一把这种锄头去做样子。还发明了少量水的田里用拖泥船载泥巴。一船可载千斤泥，大大提高了工效，这是七队队长向兴明发明的。经过一个月，将这条原来中间有小溪，两边高低不平，田坎七弯八拱，大小不一的长沟田，改成中间 1.5 米深、1 米宽的利水沟。两边各一米深、宽的灌溉沟的三沟配套，对所有的田坎打破老界进行“开肠破肚、填沟去界，挖高填低、小田变大、大用划小，据脚杆、砍脖子”的改田方法。达到田埂直、求方圆。便能排能灌，能增产的目的。

在改田工地上，干部带头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兵，村支书朱定远不慎脚受了伤，简单包扎一下又坚持劳动。党委书记田海全带领全体乡干部同群众一起劳动，一样糊得周身稀泥巴，有的只现两个眼睛在转，上下一心给群众很大鼓舞，取得了首战告捷。给全乡改田树立了样板，群众看到这一片从新安排的水田、三沟齐全，田坎笔直，全部梯形、排灌自如的水平梯田，看起美观，那个不高兴啊！正如大队宣传队编的花鼓词“朝阳人民学大寨（文革中改的公社名），艰苦奋斗意志坚，男女移山干劲大，山河面貌重安排，全部实现田园化，大寨红花遍地开”。

后来省县领导先后前来查看，原副省长李林枝，省革委农业组副组长张斌，绵阳地委书记于希文，副书记王德力，县委书记周厚国，副书记席先德、羊新民等都来总结经验。大家看到改后的新面貌，整齐的庄稼，都很受感动，全省宣扬。本县各区、社前来参观，省内宜宾地区组织来参观学习。先后来参观学习的达 2500 余人。后来该村又将 1、2、3 队改一片 150 余亩进行改造。全村完成 570 亩，占了水田的一半以上。该村又投入改造坡土的工作，组织改土专业队，长年累月战斗在改土工地上，求梯形疏水系，增土层，栽草皮，搞绿化，建大寨式的海绵梯田。改土与修机耕路（后来成了村道路）、植树造林，理顺水系结合起来。在改土中学大寨的郭凤莲铁姑娘队，她们组织了以青年妇女和下乡女知青组成了

铁姑娘队，队长向咏梅（后调乡作蚕桑辅导员），她们吃住在一起，同男同志一样挑土、抬石头，打炮眼，每个人手上打成很厚老茧，同农民没有区别。她们白天劳动晚上还要排练文艺节目，经过两年多的苦干，下乡知青毛代清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冉铁苗等二人被评为全县的先进个人。全大队完成改土 800 余亩，后来大队支部书记朱定远直调为公社党委书记，原党委书记调任区委副书记。

在十二大队样板的带动下，从 1974 年起，全乡掀起了兴修水利改造冬水田、植树造林的群众运动，由点到面，全面铺开，规模效益逐步扩大，到 1978 年止，全乡除扩大雷音寺水库增蓄水 30 万方外，又在全乡修小二型水库 8 座，加上原山平塘，有河埝总蓄水达到了 470 万方，基本实现了旱涝保收。在有了水利保证，又大量改造冬水田 14 片 3946 亩，修排灌渠系 89 公里，生产条件得到改善，全乡粮食产量由 1972 年的 1122 万斤到 1978 年时达到 1472 万斤。水稻由 73 年平均亩产 467 斤总产 525 万斤，到 1978 年亩产达到 730 斤总产 734 万斤，增加 209 万斤，增产 39.8%，群众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

在 1976 年公社党委书记田海全出席了全省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在会上介绍经验，被评为省改田改土先进公社。1977 年省老领导李林枝来我乡视察，并带来了新华社记者，进行了全面采访，亲临现场查看，后再《四川日报》整版篇幅作了介绍。往昔我们的改田改土的业绩，现在仍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必将留传千古。

### 艰苦创业 爱国爱社

艰苦奋斗和爱国家，爱集体都是大寨精神之一，我们在学大寨运动中，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由于文化大革命 10 年的浩劫，群众缺衣少吃，经济困难。以收成好的 1978 年为例，全乡人平口粮为 544 斤，其中水稻为 273 斤，其余全为粗粮红苕为主，作为水稻生产区人平每天仅大米为 4.8 两，人平总收入（集体部分）才 82 元，每个劳动日子 0.318 元，农民分的口粮除劳动工分，水肥投资外而倒补口粮款的仍有 1247 户，占总户数的 31%，仍欠国家贷款的生产队 44 个队，占 86 个生产队的 51.2%，尽管如此，干部群众对完成国家的粮食、油料任务未少一斤一两，以收成差的 1971 年为例完成和谷征购 380 万斤，油料 141.7 万斤，

而人平一天吃油才 1.1 斤，水稻完成征购占水稻总量 51.3%，而人平一天仅 3.8 两大米，这种爱国家的热情仍是大的，没有一人说不完国家任务。几年未要国家返销粮（按征购粮比例返回解决部分困难户），而用自己储备粮解决那部分缺粮户的困难。

### 干部参加劳动形成了制度

1964 年毛主席“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因为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因此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规定了。各级干部参加劳动的天数，成了硬性制度，每人发了一个《参加劳动登记册》，在那用参加了劳动由那里的干部填写并签名，每个季度上报每个人劳动天数，从 1973 年起，我们乡的下部参加劳动行成了自觉，全乡修每个水库，每个人都得参加二至三天劳动，参加了每一片冬水田改选工地，每人制得有专门的七上八下，劳动同时群众一样逗硬收方，党委成员负责修一座小水库，连党委成员的妇女干部都负责修了一座水库。有效的加快了水利建设和改田改土的顺利进行。公社干部范祥云，1945 年被抓壮丁，1948 年解放军部队直打到广州解放又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直到战争结束，以一个带兵一线的排长，申请回到农村，从社、到乡，长期坚持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劳动工具随人带走，干部社员都叫他“老兵”而名字都淡忘了。

在改造冬水田中、除到其他工地参加劳动外，又专门规划了一条沟作为机关单位改田工地，每个单位一块，我们乡机关分一块 2.4 亩，以一半时间下村，一半时间改田，经两个多月时间完成了改田任务，并在第二年春天负责栽上水稻。连最小的合作店占仅 6 个职工，其中五个女同志，也完成改用 0.6 亩的任务。所有机关学校共改用 35 亩。那是干部群众真正打成一片，做到了同甘共苦，关系融洽，县上下来的干部原邮电局长郑仁和是 50 多岁的南下干部，也同大家一起白天劳动，晚上开会讨论工作。总之那时把参加劳动行成了自觉性，把末去参加劳动看成是不光彩而形成了制度。

## 经验教训 难以忘怀

全国农业学大寨从1964年开始到1980年中共中央转发山西省委《关于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的批语》为止，历时16年。批语中说：“认真总结一下学大寨和三中全会以来农业战线的经验教训，以利于肃清农业战线上”左倾路线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农村政策。此间，有许多往事难以忘怀，仅简要例举如下：

1、以阶级斗争为纲：1978年以前农业战线也和其他战线一样始终执行毛主席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农业学大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陈永贵（原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把大寨大队提高总结为“大寨是农村社会主义方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是阶级斗争的典型，是爱国家、爱集体的典型，也是生产斗争、科学种田的典型”。提出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的口号，当时在学大寨中每事都要以阶级斗争挂上钩。什么学大寨没有摸到阶级敌人就是没有抓到纲要受到批评。因此无论什么运动都必须抓阶级斗争，如12村富农分子孙世斌40多岁还是单身汉，他编了一个“《十二月相亲》”的唱词，其中二月相亲是春分，百草发芽遍地生，燕儿双双配成双，唯我还在打单身。被抓住这一点硬说他是破坏农业学大寨，每次运动都抓来斗争批判，说他是破坏农业学大寨。又如一村二社富农出生的郑枢华，曾教书，参军到朝鲜参加抗美援朝。57年反右中下放回来强迫劳动，他跟他弟弟一起生活，没柴烧，被烟于熏得眼泪长流，他写了一幅对联：“流泪眼对流泪眼，断肠人送断肠人”。认为这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每次都弄来斗，他又不服，后只有压服，群众感到厌烦，后落实政策平反，退休后一直在县书法协会工作直到病故。

2、评大寨政治工分：我们互助合作后一直坚持各尽所能，按劳记分的按统一定额的评工记分制，坚持男女同工同酬，粮食分配是以60%为基本口粮，40%为工分分粮，对五保户，困难户和工干家属保促平均水平的政策。学大寨后一律以大寨式评工记分。不用定额，打镢出工、收工，只记工天，月底看好坏来记工分。在一个队先选男女各一人为标兵，其他人照此，叫标兵工分。后来又每月开

学习毛主席著作，开讲用会来评工分，讲得好的工分高些，后来普遍形成出工不出力，你上坡我上坡，大家圈圈一样多，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后来大家都不认真做工，只图混一天算一天，生产总上不去，又才恢复定额工分。

3、农业以一切按计划生产，每年以层层按比例分配各种作物面积计划，不管适不适应都严格执行。比如我们乡的棉花计划，长势再好到了收获季节就遇霖雨季节来了，总是收不到好棉花，产量长期不高，要求亩产 100 斤，但努力几十年都达不到，收不够成本，完不成定购任务用粮食去补，每年仍要分 1400 亩不能减少。水稻每年只能种二季，而每年总要分双季稻面积的 20% 的水田面积，哪怕两季不如一季，也要使贯下来。只到 1977 年后才不硬贯了，才因地制宜去安排播种面积。

#### 4、农村工作在“堵路迈步”中艰难前行

什么“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这个口号从 68 年到 78 年这十年中都在堵路迈步中坚难的进行，规定了条条款款，回忆起来，大家都不会忘记的：

一是切以粮为纲，不准种计划外的经济作物，每年层层检查，将已种的海椒、番茄、地瓜扯了再种红苕，大家不满意又不敢说，层层压，层层又硬着头去干。

二是一年到头强调出勤率，农民各人的事如修房造屋均申请必由乡上给在农闲一个一个的安排否则要受到处分。往往将全乡修房子的均安排冬腊月间，弄得大家都不好请匠人。如六大队有社员为了修房子每天晚上加班做砖胚子，花大半年做了一窑砖胚子，一直不准烧，后来被大雨淋烂了不少，损失很大。

三是所害怕伤农，发动将田边、土边的竹木树子全部砍光，群众敢怒不敢言。

四是限制农民养家禽，认为为保护粮食不受损失，鸡不准出院子、鸭子不准下田。对院子周围受损的粮食在社员口粮中扣出，一户只准养 1—2 只鸡鸭，多了就是资本主义。每年不定期的逐户清理，有时还组织干部晚上掏鸡窝子，多了受处分。但每年又分配各家各户必须完成鸡蛋统购任务。

五是限制于工业生产：如我乡五村六村有百多户人会编织麦草草帽，以前每年热天到周围场镇卖，从那时不准打，当成资本主义歪风批，至此手工业失传。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业学大寨成了历史。对这段历史影响我乡当时那一代人，现在回忆起来有很多值得总结的东西。将此段问忆记录



让后人了解，以利吸取正反经验，为后所用。

范志民

## 人鸟情结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为了彻底改变城乡落后的面貌，提高全民卫生水平，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就在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当时认为蚊子苍蝇老鼠是传播疾病的元凶。而麻雀要糟踏粮食，它们的存在必然与人争粮，影响粮食生产，于是就把这四种动物定为“四害”，必需予以消灭。于是就在全国开展“除四害，讲卫生”的爱国卫生运动。

为了消灭麻雀，一九五七年初夏的一天，举行了全国统一的“驱赶麻雀”的活动。

那时，笔者正在本乡读小学。有一天放晚学的时候，全校师生都集中在操场，听学校领导传达乡领导的指示：“明天都不上课，学生全部回家，参加全民赶麻雀”的活动，老师也分别下到队里，参加此活动。活动之后还要统计战果，班与班之间还要比赛，看哪个班捉到的麻雀多。

放学回到家里，果然发现农民们第二天也不干农活，全部出动赶麻雀。

次日早饭后，生产队据大队（村）的统一安排，无论大人小孩都倾巢而出，他们人手一件工具，有的拿响篙，有的拿竹竿，有的拿长扫帚，有的提锣鼓、铁盆、铜盆……分别站到各自的岗位上，有的守山头，有的守埡口，有的守田坝、山沟。时间一到队长鸣锣为号，人们就开始行动，一时间吼的吼，吆喝的吆喝，有的挥舞响篙，有的敲锣，有的打鼓，有的敲铁盆铜盆，也有极少数人放鞭炮……

名为“赶麻雀”，其实人们见鸟就赶，所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麻雀被赶也殃及其它鸟类。无论是田坝山沟，或者山山岭岭到处是吼声，到处有锣声鼓声，鞭炮声，全国几亿人几乎一齐怒吼。

可怜的麻雀和其它鸟类尽皆惊慌失措，漫天乱飞。等它们飞累了，想歇歇翅膀，想停停脚，可就是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有的甚至飞着飞着就从空中掉到地面摔死了。

此活动最新奇，最刺激，我们这些小屁孩们本身就有好动的天性，这时又领受了这神圣的使命，所以我们吼得最卖力，跑得最快，一见自己守护的“领空”有麻雀及鸟儿飞过，就破起嗓子吼，又拼命地敲打手中的响器。一旦发现有麻雀、野鸡想在自己的“领地”歇脚就亡命地奔过去逮捕归案，甚至当天晚上在梦中都在呐喊。

驱赶麻雀的人中午也不下岗，只让少数人回家煮午饭，然后送到野外给家人吃。

一天下来战利品不仅有麻雀，还有老鹰、斑鸠、画眉、喜雀、阳雀等等——这就是“全民赶麻雀”的运动的实况。

正所谓“人类要向大自然索取，大自然就要向人类报复。”人类如果不和大自然和谐相处，到头来就要自食恶果。所以后来蝗虫危害出现抬头的势头，农作物的其它病虫害有所发展，人们才进行反思。

科学家们发现麻雀是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它的存在虽然有糟踏粮食的一面，但在消灭病虫害方面它又是有功劳的，这是它存在的合理性的一面。一九六〇年在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时就马上予以纠正，把麻雀从“四害”中剔除，而添上“臭虫”仍然统称为“四害”。

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人们的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对大自然有了更科学更客观的认知，对世界的客观规律就有了更正确地了解，懂得了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蛮，于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提法才渐渐减少了，没有了，代之以“保护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绿化祖国”的提法，甚至还有专门的立法。麻雀等鸟类也同时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护，不再被随意猎杀。

现在好了，国土绿化面积一年年扩大，连寸地寸金的城市，在建筑规划、审批时都必需达到绿化的要求，城市规划都得考虑足够的绿化面积。所以现在不但农村到处有鸟语花香，就连城市街道、社区每日清晨都会听得鸟鸣阵阵。白天也能看到遍地麻雀和一些不知名的鸟儿们，他们毫不怕人，成群结队大大咧咧地满

街觅食，有的还飞到粮店啄食大米小麦等。

可现在又出现了新的问题——鸟害。特别是农村，封山育林后森林复盖率越来越大，到处绿树成荫，有的地方树木繁茂连人都莫法钻进树林里去。这些树林自然就成了所有鸟儿们的天堂，它们大肆繁衍，以至“鸟丁”兴旺。

现在消失多年的白鹤、老鹰、喜鹊、野鸡等都大量出现了，它们要生存就要觅食，就要和人争粮。它们和麻雀就呈现“鸟多势众”的趋势，胆子很大，根本不怕人。农民在土地的这头播种，它在那头刨种子吃，农民在家里院坝边喂鸡鸭，野鸡竟敢跑来和鸡鸭抢食。

成熟的庄稼被它们啄食倒也不计较，最不能容忍的是它们要刨食农民播下的种子。现在农村是普遍禁猎的，凡有人打鸟就会被举报，被追究，甚至被处分，所以鸟儿们也就更加有恃无恐，给粮食生产造成一定的损失。

农民为了自身的利益，想了很多驱鸟防鸟的办法。他们在即将成熟的庄稼地里立“稻草人”，“稻草人”随风摆动看似人在驱赶，以此吓唬鸟儿。农民又买来五颜六色的专门驱鸟的胶条，拉挂在庄稼地周围，风一吹胶条不断改变方向，便呈现出晃动的光彩，使鸟儿误认为有人在操作，便远远地逃避。

但“空城计”只能用一回，这些办法只能一时有效，久而久之聪明的鸟儿看破了农民的“诡计”，也就不怕了，仍然我行我素糟踏庄稼。农民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人悄悄对鸟儿下毒手——用毒药拌种或者撒拌有毒药的粮食毒杀，有的也用鸟夹、鸟笼、鸟网等等进行捕杀，有的也偷偷用猎枪射杀。

人鸟之争显然是一组矛盾，这组矛盾至今没有有效地解决。还望有关专家学者能找到一个人与鸟的合情合理的“契合点”，最终达到人鸟和谐共处的目的。

全文 2100 字

以上三篇共 9458 字

作者 邓正洪（三家中学退休教师）

电话 13982582371

## 我所经历的农业合作社

我是从农业合作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农村基层干部。对这段亲身经历的历史有很深的体验，以此回忆让后人了解这段中国农业发展进程中，很值得了解的重要历史过程。

农业合作社是以换工队，临时或季节性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再建立初级农业合作社，基本以一个居民组建一个合作社所以当时叫小社，后发展到以村建立的高级农业合作社所以叫大社，这样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当时为什么要走组织起来的合作划道路呢？这里得从我们国家的半封建的落后的农业国形成说起。祖先从各自带领家族人开垦土地后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逐步的由于各种天灾人祸，有的人就得出售自己的土地而求得生存，这样长此下来一些人失去了土地，一些人聚集了更多的土地，有土之人种不完，无地之人无地种，就形成出租土地和租地为生的出租剥削，那时租田耕种，一亩田仅能收 400 多斤谷子，而每亩每年必须交 300 斤（当时叫一担）给老板，种地人只能剩下土里的粗粮为生，我们土地改革以后，达到了耕者有其田的革命目标，但各家有不同的情况，加上在那落后的耕作制度，长期使用而退化的种子和受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加上各有不同的天灾人祸，是小农经济形式无法战胜的实际，所以只走组织起来的合作社道路才能摆脱走老路的危险。

有人说那后来为什么又要包地到各家各户去呢？根据我们的经历那不是道路上的问题，而是后来工作出现的问题。因以土改后到合作化的 58 年以前，农业得到大发展，激发农民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粮、棉、油的产量得到大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大提高，各种物质丰富，人人安居乐业。由于后来左倾的大跃进，共产风使农业受了大害，才走了回头路，农业要发展只有走现代化的大农业道路才是根本出路。

当时的合作社先由几户十几户在农忙时互相换工起，只互相帮助不算帐的简单换工，后根据外地经验，由十几户到 30—50 户人组成互助组，后形成常年互助组，为了算帐简化，当时以每季各人计划各的农活所需用工数用竹片做成工

分牌，一面写工分数，一面写各人的名字，由组里统一做，并记下各人的工牌总数，今天在你家做了多少工，计成工分将自己的工分牌如数交给组里，当天评到各人所挣得的工分由各人收好，到一季算帐将各人挣的工分当到换回自己付出去的工分，剩的收钱，少了补钱，统一定为每工分五分钱，当场结帐，如有欠帐的以同收钱户挂勾，这样不须要会计，因那时能算帐的人很少，我当时在学校读书，星期天去参加劳动并经常得到算帐和写工分牌。基本上是 52 年是互助组，54 年一个乡建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55 年上半年一个村建一个社，到 55 年冬天就全部建成了初级农业合作社，叫半社会主义性质，因为有 40%为土地分红，60%为工分分配，56 年全部建成高级农业合作社，以村为一社所以叫大社，成了全社会主义性质，就取消了土地分红，但仍以小社核算，只统一领导。

从建初级社是要有条件的，首先要达到常年性互助组，同时必须有骨干、社长先由上级考查，征求群众意见后，调去参加县上干校培训考查后由群众选举，一般的必须是共产党员。会计选有一定文化，政治可靠的人，经县上对政治、业务培训考试合格才能担任会计。我就是 55 年小学毕业后参加县上一个月培训后担任会计的，同时有统一的章程和原则，建社时以自愿、公平、公开、节俭的原则。当时除地、富家庭不能入社外，其余的人必须自愿报名入社，入社后将各自的耕牛、大型农具，如犁、耙、水车、拌桶等农具全部入社，统一按成折价，全社折价总数又以入社人口平摊、算收补一律现金逗硬，对没钱户，国家有专门的贫农合作基金贷款。公开一切章程制度、入社土地、耕畜、农具、当众评成折价，土地因只有田固定亩分，土是以土改时估计能收五挑红苕为一亩入社时逐块从新丈量。因为我们是冬天建社，小春已播种完毕，一律以青苗折价入社，每亩用种、工分以统一定额数计算，水粪以各自多少而评定，对小春时挑了沙沟沙凼要一个一个的丈量以立方米评分。这是一件麻烦而细致的工作，花去三个月时间才做完，所以做下来后，大家很满意。对未入社的农民和不能入社的地富仍然单干，直到 58 年建公社时才全部纳入的。

一切开支有严格的财务制度，生产性开支、年初统一作计划，按计划开支。非生产性开支，10 元以下由社长审批，10—50 元，由社委会讨论审批，50 元以上由社员大会讨论同意，每月结一次，现金、工分、水肥投资帐目，水肥投资先以评成色，粪桶统一过秤计算，后来改称猪，每月初称，100 斤一月计 3.00 元，

只称到 150 斤止，人以 15 岁以上的大人，一月计一元，以下小人一月 0.50 元，工分水肥每月结清一次，社员大会公布并填入各户手册上，年终决算。

分配政策，严格按国家规定办理，分配办法以“双四六”计算，即现金以除去一切开支后，纯收以 40%为土地分红，60%为劳动工分，建大社后取消了土地分红后就全部以工分计算。粮食分配，以 60%人口分，40%工分和水肥投资分，又其中的 60%以工分分，40%以水肥投资分，每年以大春、小春两次估产试算和收后以实产决算。各户工分款投资款减去分粮款，为多收少补，决算后兑现，无钱补的互助挂勾。

在建立农业合作社时同时又建立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总称农村三大合作社。供销社和信用社从 53 年建立，以年满 18 岁的人口计算入股，先自愿入股，逐步扩大股，先人平 1 股投 1.50 元后增到 3 元，每年收入盈余以股分红，集体钱全存入信用社，个人自愿存，集体每年需贷款，年初计划按此放款，个人贷款经审查批后可以贷款，按统一国家规定利息，供销社统一收购农副产品（没建粮站和食品站前）以国家统一价格，各种肥料、农药、人们所有生活用品由供销社供给，是农业的后勤保障，三大合作互相支持，使农村、农业、农民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各种物资丰富，生活得到了大的改善，人人安居乐业，国家兴旺，直到 1958 年大跃进以后，打乱了农业的正常发展，直到后来一些左的东西出现使农业和国家走了一些弯路，使后来改变各种政策又重新走向了自主发展的道路，如一直像 58 年以前的方向发展下去，可能又是另一种局面吧。

作者：范志民

2019 年 5 月 15 日

### 我所知道的农村土地改革

我们这里是四九年十二月份解放的，五零年进行了征粮剿匪，减租退押，五一年进行土地改革。我当时尽管还不很懂事，但因我母亲是在县上参加了培训的农民代表，我常跟到去参加各种会议，看到他们查田定产、划成份、斗地主、分田地、农具。长大后又亲访了些当时参加土改的老同志，特别是参加工作后，在乡办公室工作过十年，亲自清理了我乡土地改革各种历史资料的归档工作，更

加明确了农村土地改革的全部情况。下面看我乡土改的一组统计数据，就知道很多情况了：

我乡土改时共有 2206 户，9728 人，耕地为 17373 亩，人均耕地 1.79 亩（不包括后来并入我乡的治田村），有地主 156 户，占总户数的 7.1%，人口为 364 人，占总人数的 3.7%（因有外乡的地主有土地在我乡的客地主，计算户而计算人口），共占有土地 6923 亩，占总地面积的 39.7%，户平 44.3 亩，人平 19 亩。有富农 69 户，占总户数的 3.1%，人口 323 人，占总人口的 3.4%，占有土地 1699 亩，户平 23 亩，人平 4.9 亩，农民（包括中农）共计 1981 户，占总户数的 89.8%，人口为 9041 人，占总人口的 92.4%，共有土地 8852 亩，占总地面积的 51.1%，户平 4.4 亩，人平 0.89 亩，从粮食占有情况看（以 1949 年的数）地主人平 3996 斤，富农人平 955 斤，中农 608 斤，贫农 146 斤，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本，在这样贫富悬殊的情况而必须进行土地改革。

土改的具体步骤分为查田定产，划分阶级成份，土地从新分配，发土地证等几步进行。

土改正式开始前，从经过了减租退押后有了基础，首先各级组织和培训干部队伍。以南下干部为各级领导，并从当地吸收有一定文化和觉悟的人员为工作队成员，先后在地干班（地委干部培训班）、县干班培训考核合格人员，组成土改工作队，又在各乡村选派农民代表，集中到县上培训，学习政策、方法、工作步骤，回来各级成立农民协会开始工作。

首先查田定产，摸清各家各户土地情况，当时田有经过丈量后的固定面积，在一个组以内大家都知道，但土是没有面积的，以当时统一的能收五挑红苕为一亩，各自将自己的土以此为标准将每块土用竹块块写起土名、所有人、估计面积，后经农会代表组成查田组来评定，在大会上公布定案，造下名册，为了基本平衡，又将水田、干田、土分成三等七级，分别定出通产、水田分甲、乙、丙三级，甲田以有水源天干天湿都能栽秧的每亩定产为 500 斤，有一定水源又不能保年年栽秧为乙田为 400 斤，望天田为丙级定产 300 斤，干田定产 200 斤，土分好土为甲土定产 200 斤，以次类推，乙土定产 150 斤，丙土定产 100 斤，丁土定产 60 斤，以后以此通产计算公粮，成立合作社后的土地分红，均以此计算。

土地占有情况清楚了，就以此按照土改法，以解放前三年为基数，全部以

剥削为生划为地主（出租土地剥削，雇工剥削，放高利贷剥削总称为三大剥削），有部分剥削而自己又劳动如土地租出部分，自种部分，加上雇工，放高利贷为富农，土地全自种自食有一定耕畜农具的为中农，以下为贫农，无地全部帮人为生是雇农，对因自有不多的土地而无劳动力耕种出租的为小土地出租（土改后以中农看待），还有一些特殊情况进行特殊处理，如以解放前三年够得上划地主，但到解放时，土地卖光了已成了无地户这种划破产地主（当地主对待），自己无土地，但有钱去典当了土地又去出租（因典当的土地有使用权无所有权）加上其它剥削以此为生为二地主，当地主对待。对自己无地或少地又去租了一些土地来种，除自己劳动外请了长工、耕畜、农具齐全，生活富裕为佃富农（土改后当中农看待），当时对阶级政策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打倒地主。具体政策是对地主进行没收全部土地和房屋。征收富农出租的土地和房屋。分土地以乡为单位计算，除去中农和自贫农以原土地不动，其余无地户、少地户，包括已被没收了的地主均以人口分得平均的土地，土地少不够分的村，将无地的农户迁往土地多的村去分地分房。这些户到新的村后优先分好土好房，所以都愿外迁。对未分完的土地留作公地，交由有劳动力的人种，只交公粮，入社后交给合作社为集体土地了。对未分土地的中农、自贫农每户均分给一件家具、小农具作为纪念。对中农、佃中农土地未达到平均数的仍补足平均土地，再多也不动为自己所有。

土地改革是一场革命，是不平凡风顺的就做下来的，既然是一场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所以除在解放时，有的地主阶级就勾结土匪进行反革命暴动，杀害革命干部和积极分子，所以先有个镇压反革命运动，对恶霸地主、土匪头子进行了一批镇压，有的关、有的管、有的枪毙。发动受苦群众在大会上控诉地主阶级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的血泪帐。首先斗倒了地主阶级的威风，最后又给出路，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止。对斗地主只针对划为了地主、富农分子的人，指解放时已年满 18 岁以上的人，不包括子女。后来每年摘去少数人的“帽子”，到 1979 年全部摘去“帽子”。因为他们已改造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

作者：范志民



## 一首曾风靡一时的歌唱遂宁的老歌

谭清友

今天的许多人，可能只知道歌唱遂宁的歌曲《人间遂宁》，却不知道在五十年前，在遂宁那时还是县制时，就已有有人创作出了一支专门歌颂遂宁风光秀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的歌曲。那歌曲的名字是采取直接抒发真情实感的方式命名的，名叫《遂宁好》。

歌曲共分两段，两段的句式比较对称。

第一段是：

遂呀遂宁好，遂呀遂宁好，

千里丘陵出呀出百宝。

涪江的流水长哟，

两岸多富饶。

种桑来养蚕，

产棉又产稻。

龙飞凤舞发电站，

水在山上绕啊，水在山上绕。

第二段是：

遂呀遂宁好，遂呀遂宁好，

山好水好人呀人更好。

机械来改土哟

大地换新貌。

电站描新图，

工业掀高潮。

金波银浪映蓝天，

红日当头照啊，红日当头照。

这两段歌词，可以说算是反映了当时遂宁的真实情况。第一段歌词写出了地处丘陵地区的遂宁，有涪江流域穿过，是美丽和富饶的，产棉花和水稻等主要农作物，而且种桑养蚕也是当时该地区的突出特点。现在的安居区，在没有成立

区前，都属于遂宁县的辖区。那时的拦江区、横山区都是有名的产棉区，三家区是有名的盛产水稻的地方，西眉区就是种桑养蚕最出名的地方。

歌词最后几句：“龙飞凤舞发电站，水在山上绕啊，水在山上绕。”这也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写照。现在的人听起来可能有些一头雾水，不理解，但当时确实有水在山上绕来绕去。

在遂宁县城西面，当时政府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挖掘出了一条人工渠河，引涪江河水，直达龙凤，并在龙凤修建起了发电站，这在当时来说，算是一件浩大的工程，也是值得称赞的大事。歌曲创作者把“龙凤”这个地名的二字拆开，变成独具诗情画意的“龙飞凤舞”，可以说是用了一番心思的。那“水在山上绕”又是指的什么意思呢？如今的人可能不知道。那时，也就是六十年代，农村还要关冬水田，到了四月左右，栽秧子时，农民就要把田里的水放去一部分，怕水深了，完全淹没了秧苗，秧苗不易成活。栽秧后，随着秧苗的生长，加之田里的水会随着天气逐渐炎热而蒸发，会导致田里缺少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保证粮食丰收，各地筑起了拦河堤，蓄水的堰塘，把水蓄存起来，而且还建起了提灌站，在山腰挖出了水渠，打起了穿山洞。田里需要水时，就可以通过提灌站，把河水抽到半山腰的水渠里，让水通过山间的水渠，在山上流淌，然后从山上放下来，放到水田里。我的老家在现在的横山镇白楠村，紧挨白鹤堰边，那时叫黄楠乡。白鹤堰就是当时把一条小河筑堤拦起来的水库，并在堤坝旁边修了提灌站，在山上修起了水渠，提灌的水，可以供应当时的聚贤乡和黄楠乡部分农田使用。歌曲中“水在山上绕”的来由就是这样的。

歌词的第二段在第一段的基础上，意思上有了些升发。从第一段的描写基本事物，到最终写人，写人的精神，抒情意味更浓：“山好水好人呀人更好”，“金波银浪映蓝天，红日当头照啊，红日当头照。”既表达遂宁人民对当时美好生活的赞美，也抒发了对当时美好前景的期盼：“红日当头照”，也算是达到了歌曲的高潮。

那么，必然有人要问，这首歌曲到底是由谁人创作谱曲的呢。事情还得从一九六三年说起。

一九六三年，全省在农村丘陵地区提倡改土改田，提高土地质量，增加粮食产量，而且规模大，雷厉风行，各行各业都在配合抓好这一工作，找重点，搞

示范。当时遂宁县的上宁乡是全省丘区地区改土造田的试点单位，且具有成效，省上十分重视。

为了抓好这个改土造田的农业样板，扩大宣传，扩大影响力。于是省上便组建了一支由文艺部门人员组成的、人员很精干的农村文化工作队，专程来遂宁蹲点，一方面深入改土造田工地，参加劳动，了解情况，一方面又结合实际，进行创作和演出，为改土造田鼓劲加油。

据相关人员回忆，当时来的遂宁农村文化工作队的演职人员，大概有十多人，都是省上的大家名流。这十多人中，就有原四川省歌舞团任创作员、眉电影制片厂长期从事创作、编辑、评论工作，而且作品颇丰的赵尔寰，有后来被誉为四川电影事业的“红色匠人”，曾引领四川电影进入火红年代的原峨眉电影厂厂长杜天文，还有演唱者，女高音歌唱家李存莲老师，男高音歌唱家叶志盛老师，谐剧祖师王永梭，四川清音大师肖顺瑜等人。

他们到来之后，在短短的时间内，就风风火火地创作出了《遂宁好》这首歌曲，没有具体创作人，算是工作队的集体创作了。但当时人们推测，歌词有可能是赵尔寰和杜天文写的。

歌曲由省农村工作队创作完成后，就马上编排，组织演出，结果一炮打响。很快在遂宁城乡流传，成了风靡一时的歌曲。那时，每个乡都有广播站，每天早晨一放广播，高音喇叭一响，就会播放这首歌曲，使这首歌曲家喻户晓。人们在劳作之余，或闲暇之时，都会哼起这首歌。一旦哪个单位有演出，或节假日演出，演出《遂宁好》这首歌曲就成了首选，从不会放过。因此，这也是《遂宁好》很快流传，而且流传广泛的原因，至今，年龄在六十岁以上的许多遂宁人，还会哼出几句《遂宁好》的歌词来。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时代的变化，《遂宁好》这首歌曲渐渐淡出了遂宁人民的生活，也因文化大革命提倡唱样板戏的原因，到后来，流行歌曲的盛行，致使《遂宁好》这首歌曲只能留在遂宁老年人的记忆里了。

时间到了二〇〇六年，关于《遂宁好》这首歌曲的事情还没有结束。据黄平老师《船山夜话》一书记载，说有一天，天王居酒楼的董事长欧阳仁俊找到他，也可能是酒楼要兴隆酒楼生意，吸引顾客，想用《遂宁好》这首歌曲重新唤起遂

宁人的记忆，于是黄平老师把《遂宁好》这首歌词重新整理改写。

黄平老师应承之后，根据遂宁的发展，在歌词中加上了遂宁发展的一些新的元素，比如达成铁路、涪江三桥等内容。经过黄平老师的思考，最后由黄平老师将《遂宁好》的歌曲，在原来的基础上，由两段改成了三段，修改后的歌词是这样的：

遂宁好

一

遂宁好，遂宁好，  
千里丘陵出出百宝。  
涪江流水长，  
两岸多富饶。  
遍地瓜果鲜，  
产棉又产稻。  
油菜花开金灿灿，  
牛羊满山跑。

二

遂宁好，遂宁好，  
苍松翠柏藏古庙。  
灵泉朝霞美，  
广德夕阳娇。  
江边荷花艳，  
公园笑声高。  
渠河碧波映船山，  
歌声云里飘

三

遂宁好，遂宁好，  
山好水好人人更好。

巧手绘宏图，  
勇敢又勤劳。  
铁路连四方，  
涪江架长桥。  
一座新城迎朝阳，  
都夸遂宁好。

黄平修改歌词后，欧阳仁俊按原《遂宁好》的曲调基础上，根据新词重新谱上了曲调，并在他的天王居酒楼演唱，后来还制作成了视频，虽然它一时重新唤起了遂宁人的美好回忆，激溅起了几粒心灵的火花，但持续时间不长，后来也还是慢慢地被时髦的流行歌曲所淹没。

但不管怎么说，《遂宁好》这首歌曲，在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的人们心中，留下了一段美好的记忆，也是值得怀念的。

### 猪儿公司、肉票及其它

“猪儿公司”是当年人们对“食品公司”的戏称，只因它虽名曰“食品公司”，实际大多只干收猪杀猪卖肉的行当，所以人们称之为“猪儿公司”。而食品公司的人对此称呼也习以为常，甚至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他们还引以为自豪，用现今之精典用语则是：“我骄傲！”

猪肉是人们主要副食之一，它上市供应的状况是社会经济状况、民生状况的直观反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猪肉的产销和其它商品一样都处于自然的市场经济状态，自主生产，自由贸易，自愿消费。生产者主要是农民，经营者主要是个体商贩，消费者主要是农民及城镇居民。生产、经营、消费三者之间的关系完全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进行调节。

农民养猪目的有三：一是为了得到肥料种好庄稼。“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当年无化肥，种庄稼所需肥料只有自己养猪生产，所以大集体时宣传说“一只猪就是一座小型化肥厂”，于是就限至农民养鸡鸭鹅，说那是“搞资本主义”，却强调养猪，即使亏本也要养，说是“养猪不赚钱，也能肥块田”，所以要求“一人一猪，一亩一猪”。二也是为了吃肉。一般政通人和的年景，一到冬腊月，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杀“年猪”，无“年猪”可杀者会被人轻视，起码会认为这户人家不能干。三是为了赚钱。养猪也是农民的主要副业，社会上流行有“穷不丢猪，富不丢书”之说，意思是“再穷也不能不养猪，再富也不能不读书”，并且这项副业能消化掉种粮过程中产生的副产物，如农作物的稿秆、藤叶等，还能将剩饭剩菜处理掉，这些东西本不值钱，把它喂进猪肚子里，经转化而变成钱。所以农户一般都有养猪的习惯。

猪肉自产自销的经营模式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发生了变化。一九五四年，各乡镇开始组建“食品组”，各区开始建立“食品站”，县则建“食品公司”。每个组每个站一般只三至五个员工，主要从事买猪杀猪卖肉的工作，目的是限制私商，杜绝掺杂使假，短斤少两坑害消费者。至年底，乡级食品组又纳入供销社经营。

三年困难时期农民很少养猪，特别是农民被集中到队里伙食团吃饭的那段时间就更莫法养猪了，因此市面上几乎停止了猪肉供应，三月不知肉味，甚至半年一年不知肉味也是见惯不惊的事。所以那时期也就没有“猪儿公司”和“肉票”的概念。

一九六一年农村集体伙食团下放了，各家各户生火煮饭了，农民又寻思着养猪。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为了鼓励农民养猪，政府又出台卖留各半的政策：农民养肥的猪，运到食品站去卖，杀了“开边”之后大的半边卖给国家，小的半边自己挑回家吃。

农民辛辛苦苦养的肥猪，自己能吃到肉了，他们的养猪积极性空前高涨，农村出槽的肥猪逐渐增多，不但超额完成了外调任务，支援了国家外贸出口，地方上猪肉供应也丰富起来，猪肉又敞开供应，不收肉票，于是肉票也失去了它的威风，拿着肉票排着长队买肉吃的现象没有了。而且还出现了供销社员工挑着猪肉走村串户吆喝叫卖的现象。

一九六四年各乡再次建立食品组，猪肉的经营权又从供销社回归到食品站。开始食品站仍旧从事生猪的收购，鲜肉的制作和销售。一九六六年后物资供应又开始紧张起来，农民卖肥猪只返肉票，不再返肉。机关干部、城镇居民都按每月每人几两或者半斤的定量发肉票。但有的时候肉票在手却无肉上市就买不到肉，也有的人肉票捏烂了，弄丢了当然就更买不到肉。

食品站的职能也随之变了，变成对肥猪的收购和猪肉的生产销售的控制和垄断，肥猪和粮食一样由国家实行“统购”，不准养猪者（无论集体和个人）私自杀猪吃肉，如有违反者就是违法，就要依法处理。

如此一来，农民的养猪积极性自然就不高，加之粮食不够吃，人都吃不饱哪还有粮食去喂猪呢？大家都不愿去干这赔本的买卖。于是层层压任务，县划任务到每个区，区划任务到公社（乡），公社又把任务分解到各大队（村），大队划任务到各生产队，然后落实到农户。

正如强扭的瓜不甜一样，强压任务“压”出的肥猪也就不肥，一百五十斤重的猪，不管肥不肥都被赐封为“大肥猪”。市面猪肉供应又紧张起来，食品站收不到肥猪，也就无肉可卖。这现象一直延续了十多年，直到改革开放，物质迅速丰富起来才得以彻底改变。一九八〇年开始，猪肉又敞开经营，肉票这个“短命的尤物”也就消失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仅存在于老一辈人的记忆里。至九十年代初各地的“猪儿公司”也自然寿终正寝了。

艰苦的年代也产生出一些精彩的轶文趣事，不无幽默意味，如：

### 1、猫比肥猪大

一九六〇年，笔者在三家中学读初中。那时几乎没肉供应，师生要吃肉只有学校自办饲养场，自己养猪。那年国庆节，学校决定杀两头猪给师生加餐，但又不能私宰猪只，姓钟的总务老师就把猪赶到供销社去杀。学生们见了暗自高兴，只等着钟老师弄肉回来打牙祭，饱口福。

结果呢，加餐时每个学生分到碗里的肉却少得可怜。学生们愤怒了，但又不敢发作，就暗查原由。原来原因有二：一因钟老师办事不力，两头猪被供销社强行刮去了两大张猪皮，皮多自然肉少。二因“亲为亲，邻为邻，和尚只为出家人”——钟老师护着老师，教师食堂多佔了一些肉，所以学生所得无几。大家极度不

满，议论纷纷，总想寻个发泄的机会。

一天晚自习后，师生们都到井边打水洗嗽（那时尚无抽水机），恰逢钟老师也到井边打水，学生们便三三两两躲在暗处直呼其名：“钟某某，把猪皮拖回来吃啊！”“多吃多占，必定是坏蛋！”他急了，寻声追去，可一转背这边又在喊叫，他追回来那边又在喊叫。这种“游击战”把他急得莫法，去告校长，而校长早闻学生不满，反批评了他几句，结果弄得怏怏不快，灰头土脸。

不几天学校死了只大肥猫，教师食堂的炊事员认为老师吃猫肉有辱斯文，不屑于打整。而学生食堂的师傅们见丢了可惜，虽是猫肉也是肉啊，于是就打整干净后将猫肉煮给学生吃。结果学生们碗里分到的猫肉比前次分到的猪肉还多几颗。因此三家中学学生中盛传：一只猫比两头肥猪还要大！

有调皮的、胆子大的学生，就想设法把“一只猫比两头肥猪大的故事”神乎其神地讲给老师听，讲给学校领导听。潜台词是：你们多吃了我们的肉，我们晓得！！

## 2、巴望母羊下死羔

早些时候学校是要给生病的学生特供“病号伙食”的。三年困难时期，很多学生患了水肿病，学校却爱莫能助，拿不出什么好饮食给患水肿病的学生补身子。

而当时学校饲养场养有一群羊，间或有母羊下死胎，有时一只母羊还不止下一只死胎。那死羊羔又脏又腥臭，通常是往厕所里一丢就算了。可不知是谁发现了“商机”，也许是学校领导动了恻隐之心，来个“废物利用”，就叫患肿病的学生们自己拖去打整，之后自己煮好分而食之。开始学生们还嫌齜齜，但有的炊事员心肠好，就帮他们打整，甚至还给一点点盐巴调料等等，还劝他们说：好歹那总是肉。又说羊胎大补。加之强烈的求生欲使他们也顾不了许多，只好放下秀才的架子，血淋淋地干起来。

这一尝试，真的不错，他们就上了瘾，就轮流去饲养场“站岗放哨”，盯着大母羊肚子，盼望它们快快怀孕，多多地产死胎，一发现情况就让人回去向大家报“喜”也留人就地继续守候。

一次母羊夜里下了仔，白天又不见了羊羔，于是饲养组的同学就怀疑是“水肿病们”吃死羊羔吃上了瘾，有意弄死藏匿了羊羔，就报告了老师。老师就把“水



肿病们”弄去审问，男“水肿病们”大呼冤枉，女“水肿病们”就哭哭啼啼，闹得乌烟瘴气，校园不宁。老师担心再查下去会酿成大的事故，最终“水肿病们”都被“无罪释放”，偷羔之事才不了了之。

事件还在继续，于是很多同学都想患上水肿病。晚自习时校医一到教室普查，学生们都迫不及待地伸出自己的小腿让校医看，挤不拢边的，轮不上被校医检查的学生急得不住地喊：“看嘛，我的脚也肿了！”“我已经肿了好几天了！”一时间，教室里不闻朗朗读书声，只听“我脚也肿”声声唤。

### 3、巧泄怨气

尊师爱生原本校园传统美德，可物质匮乏的年代师生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学生们吃不到肉，总怀疑那点点供应量被老师们佔取了，有怨气总想着发泄。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四年我在遂宁中学读高中，班里有同学就发明了一个方法，可当作老师的面大胆喊：“老师按倒学生吃。”老师明知所指，但也一笑置之，因抓不住把柄。

原来中文句子“老师和学生”翻译成英文是“teacher and student”，而“学生”一词英文复数末尾应加“s”，读音近似于中文的“吃”。学生中的“发明者”就巧用这一点借题发挥，背英语时有意把“teacher and student”读作“teacher 按倒 student 吃”即“老师按倒学生吃”，同学们听了心领神会，拍手称快，并且也纷纷效仿，借以发泄心中的怨气。

一旦有学校领导到教室巡视早自习时，学生们翻来复去就背那一句，一时间满教室都在喊：“teacher 按倒 student 吃”（老师按倒学生吃），领导也心知肚明，但也奈何不得。等领导一出教室后面学生便轰堂大笑——总算淋漓尽致地发泄了一回。

现在想来老师也冤，那个年代他们也缺少营养，并且未必他们真的就“按倒学生吃”过？

### 4、美味的荆骨肉

困难时期有首民谣：“真银行，假粮站，乌七八糟食品站。老师没得着，光眼看。”老师只掌握着粉笔，而粮、油、肉、糖等等都属奢侈品，老师无缘接触，只老老实实享受国家分配那点副食品，有时甚至分配的肉票洗烂了，放丢了还买

不到肉吃，三月不知肉味是常有的事。

但老师也有老师的优势。学校是人才汇集的地方，棋琴书画，吹拉弹唱什么人才都有，而其他单位那时的员工一般文化层次都不高。一旦上级下达一项什么政治任务，有时还特别紧急，如写政治标语，唱革命歌曲，唱样板戏，或者上报表册刻腊板印材料等等，他们就只好到学校求助于老师。

七十年代初，我在大坡小学当民师，当时的食品站就常常到学校找老师帮忙，干些应急公干。至于回报的事，他们说猪肉猪油是不敢乱动的，只有猪骨头他们食品站就可以自行处理，于是答应每个月卖些猪骨头给学校。

那年代，猪骨头简直是好东西呢，一斤骨头可剃一两巴骨肉，可熬一两骨油，所以熬骨头的时候就是老师们过节的时候。午饭后炊事员把买来的骨头清洗干净，然后倒进大铁锅里熬，直熬得铁锅里浮油一片，满校园香味弥漫。放晚学后教师们每人拿上一只大碗，喜笑颜开地涌进厨房，“积极”地参加“义务劳动”——剃骨头。其实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剃着剃着选好的肉塞一坨进嘴里，迅速地嚼烂，迅速地吞下。虽无盐，但很油，很香，很好吃。当然这一切都只是“地下活动”，要背着领导干。而有的领导也很亲民，很随和，往往“放弃原则”，睁只眼，闭只眼，不注意时他也塞一坨进嘴里，大家心知肚明，一团和气，乐得和平共处了事。

骨头上的肉剃完了，大家也偷吃得差不多了，炊事员就把所有的剃骨肉下到锅里，一阵油煎火爆，放齐酌料，调制好了就起锅。老师们每人便分到满满一大碗香喷喷的剃骨肉。而熬出的骨油，再由炊事员慢慢地炼，炼好储存，作为这一个月伙食团炒菜用油。

再说，有的老师分到那一大碗剃骨肉，舍不得一人独享，还送一些回家去，让家里人也小饱口福。当然也因为在剃骨头的“义务劳动”中，他们已“劳”得差不多了。

## 5、教书匠不如杀猪匠

有的学校则不然，或许是领导、教师不会攻关，或许是老师不会写画，教师们空有肉票却买不到肉吃。我曾亲眼看见这么一幕，虽是喜剧，却让人笑不出来，心里还酸酸的难受：

老师吃斋几月了，拿着几张肉票去“猪儿公司”讨说法。“猪儿公司”的人也不怕，他们不冷不热，有意傲视“臭老九”。

杀猪的说：“没有猪杀，我有啥法？”

教书的说：“昨晚你们还杀了猪呢。”

答：“那是拥军肉，供应部队了。你去找解放军嘛！”

问：“为啥你们又在吃肉？”

答：“还是前个月的供应票，昨晚才买到，今天才吃成。”

看了他们满碗的肉，“老九”们不服：“你们每月供应几两肉？”

“猪儿公司”的领导被惹毛了：“老子想吃几斤肉就供应几斤肉！你表现好点我也提拔你来杀猪。”

教书匠遇到杀猪匠就如同秀才遇到兵，不但有理说不伸，没讨到肉吃，反而还受了一肚子气。只有忍气吞声，打道回学校，捧着肉票继续吃斋把素，暗自恨自己“前辈子变贼偷了猪，这辈子倒霉来教书。”

## 6、私宰

由于政府明文规定，生猪只由食品站统一经营，大到生产队小到农户家都不准私宰肥猪，私分猪肉。但一些时间卖了肥猪仅只返几斤肉票，而有肉票又难买到肉，因此私宰生猪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逐渐蔓延。

有的生产队长自恃世代都是贫下中农，自己是根红苗正的革命后代，就敢为天下先，敢碰“高压线”。通常事先安排公猪场饲养员给选定的大猪加料催肥，让那些重点“培养”的猪们海吃海喝睡舒服，等催肥后，队长就开会发布杀猪的决定，会上约法三章，任何人不得当叛徒告密，如有人来调查，打死都不准说。还要提高警惕，对五亲六戚都不能说漏嘴，不能暴露私宰肥猪的事。有的队还人人签名，承认杀猪是全体社员强烈要求，与生产队长无关。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了，队委会选一个月黑天高的夜晚，去一个偏僻的农家院子杀猪！院子外面还派出几个民兵站岗放哨，以防“鬼子”进村，也防“叛徒”出村。

这种行为当时是非法的活动，我当年就很“庄严”地参加了一次。那活动之神圣，之欢快，之繁琐是现在的人无法想象的。

说神圣，因为当年那是违法甚至犯罪的勾当，又是大家签名保证承担一切后果的事，后事难料。

说欢快，因为那时人们常自我调侃：半年没吃肉，肠子生了锈。整夜睡不着，清口水比尿多。全队人盼星星盼月亮，才盼到杀猪吃肉打牙祭的时候，哪个不高兴呢？

说繁琐，因为分肉最麻烦。由于人们长期没品尝到肉的滋味，猪的每一个部位、每一个器官人们都想尝一尝。全队有几十户人家，猪的心肝脾肺肾，大肠小肠或是猪肚猪耳……就要分成几十份，这就大大增加了杀猪匠的工作量，因此往往分肉后各自回家时天都快亮了。

有的生产队保密工作做得好，吃了肉平安无事，而有的队因种种原因东窗事发，队长因此落下罪名，受到处分的事也时有发生。

除了集体私宰之外，也有农户私宰的现象，其方法更多，有的用绳子勒死，喂盐巴令其烧心喝死，弄到水里淹死等等，反正晚上弄死作数，天亮后向队长报告说猪突然发瘟，病死了。队长心知肚明，默认了事。这种事，属一家一户单干，保密更容易，加之人人心照不宣，互相打掩护，基本都能蒙混过关。

当然也有私宰猪只被发现，行为人受到处分，生产队长被处理，职务被撤消等，所以私宰现象仍然不敢普遍，农民实在熬不过了才偶尔为之。

经查阅一些档案资料和笔者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撰写了以上拙文，俱往矣！丰衣足食还看今朝！！

希望后来人了解昨天的坎坷，珍惜今天的幸福，创造明天的辉煌。

（全文 5718）

作者 邓正洪

电话 13982582371

## 习近平遂宁学习办沼气

1974年1月，20岁的北京知青习近平担任了陕西省延安地区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陕北黄土高坡，

满目贫瘠，山梁光秃，老百姓缺少柴火，做饭都成了大问题。刚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的习近平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老百姓急需解决的问题着手，下决心要改变这种状况。当习近平看到1974年1月8日《人民日报》介绍四川省绵阳地区大办沼气一举几得，解决了农村烧柴问题、做饭问题、点灯问题，环境卫生问题，甚至解决了沼气发电问题的消息以后，眼前一亮，就打算在梁家河办沼气。可是修沼气大家都没有经验，沼气池像什么样大家也没见过。习近平说，没有经验，咱们就出去学习！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当时北京支援延安的挂职干部、延川县委常委张之森，张之森对此非常支持。于是20刚出头的习近平与北京驻延川干部柏根柱等三人一起坐上绿皮火车，几天几夜，千里迢迢，从陕北黄土高原来到了成都盆地学习办沼气。

当时四川发展沼气情况最好的是绵阳地区的遂宁县、中江县。遂宁县横山区的黄桷公社在1973年就实现了沼气化，是四川省第一个沼气化公社，全国大办沼气的现场会也曾在遂宁召开。习近平他们了解情况后，又从成都坐上长途汽车，天麻麻亮就出发，颠簸十多个小时，天黑时才到了遂宁这个小县城，住进了汽车站旁的一个不知名的小旅馆。第二天一早，习近平他们拿着梁家河大队的介绍信，来到了县革委办公室要求学习办沼气。但办公室的同志一看是大队的介绍信，就说我们是对口分级接待，县上不接待外地大队来的人。怎么办？习近平没有气馁，而是再一次乘车回到成都，找到了他的杨超叔叔。杨超当时是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的副组长、生产建设办公室的副主任、四川省推广沼气领导小组副组长，1974年底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对习近平来川学办沼气的劲头非常赞赏，就写了一个条子给他作介绍信。习近平他们带着杨超的条子，再一次回到遂宁。县上见到杨超的条子以后终于接待了他，安排他们一行在遂宁学习了十多天时间，帮助他们学到了沼气池的修建技术。回到陕北后，习近平和乡亲们在一起反复试验修沼气池。一次，新修的沼气池发生事故，出料口被堵上了，池内的气体不断产生、膨胀，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就有可能发生爆炸，以前的努力可能就前功尽弃甚至发生安全事故，怎么办？习近平迎难而上，冒着危险，用了一根长

竹竿，大家一起使劲的通，最终出料口通了，气流带着粪液残渣，一下就喷了出来，喷得习近平和周边的乡亲们满脸周身都是。故障终于排除了，习近平把脸上的残液一把抹掉，开心的笑了。通过习近平他们锲而不舍的努力，最终在陕北的黄土高原上把沼气池打成功了，梁家河的沼气池成为了陕西省的第一口成功的沼气池。为此省里还专门在梁家河大队开了现场会，推广习近平他们修沼气的经验。

梁家河第一口沼气池打成功以后，证明了在陕北高原修建沼气池是完全可行的。延川县委作出了在全县大办沼气的决定。1974年12月，派出习近平等七个同志，由张之森带队再次到四川学习办沼气。为了支持革命老区延安办好沼气，遂宁县委专门从当时的横山区龙头公社抽调了8名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到延安地区帮助发展沼气。当时的《延安通讯》曾刊登了一篇通讯叫《取火记》，介绍了延川县办沼气的情况。

习近平在遂宁学习办沼气时，看到当时的遂宁农村不少地方都在种植烤烟，就向当地领导提出把四川的烤烟弄到陕北种，因为烤烟的产量高，价值大，能带动群众脱贫增收，也适合在陕北大面积种植。习近平就是这样，随时都在很有心地观察，很执着地学习，时时刻刻都在想着把老百姓的事情办好。

（石平 中共遂宁市委党校 18008258019）